

目 錄

■ 香港考察 ■

香港學制改革進程與歷史教育前瞻	周佳榮	1
保良局文獻回顧與研究概況	丁 潔	10

■ 人物研究 ■

陳婉衍與清末民初上海愛國運動	黃嫣梨	16
蔡元培研究概況及其展望	侯勵英	24
嚴復研究的回顧和分析	甘穎軒	37
記《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周秉德深情共話	彭淑敏	42

■ 體育史話 ■

中國體育史大事記	文兆堅	47
清末民國時期的全國運動會	黃耀忠	53
日、韓、琉的傳統節令與體育競技：以農曆新年、端午節為例	區顯鋒	58

■ 學界活動 ■

「紀念孫中山 140 歲誕辰」專題講座	資料室	61
孫中山紀念館公開講座	資料室	62
「香港大眾娛樂的轉變」展覽及講座	資料室	63
「歷史講堂」定期在中環舉行	資料室	65

* 本期封面照片：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黃曉恩小姐提供，謹此致謝。

本刊內的論著，乃表示作者的個人觀點或研究發現，並不一定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系方的意見。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record the personal views 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contribut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express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學制改革進程與歷史教育前瞻

周佳榮

一、新學制的特色和優點

香港教育當局決定從 2009 年 9 月起推行「三三四」新學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逐漸取代現行的「五二三」制（即中學五年、預科兩年、大學三年），現時兩個公開考試（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相繼停辦之後，於 2012 年開始，大學將根據新高中會考的成績取錄學生。

新高中課程規定中文、英文、數學三科為必修，增加通識教育作為新核心科目。¹ 學生可選修二至三科，「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有六科可供選擇，包括中國歷史（簡稱中史）、經濟、倫理與宗教、地理、歷史（通稱世史）、旅遊與款待。² 由於必修科目增加，選修科目相應減少，尤其是通識教育列為必修科目，對人文學科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新學制的優點有三：首先，是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的安排較為適當，可以更有效地發揮階段學習的功能；其次，是新學制有利高中與大學銜接，為較多高中生提供升學的機會；此外，就是新學制配合世界主流學制，中國內地和台灣、日本、美國等均採此制。基於上述原因，學界對新學制一般都表示支持。

但也應該指出，新學制限制學生必讀四科及選修不多於三科，總共不超過七科（現時中學會考可多至十科），會使學生在專科發展方面受到束縛，對優秀的學生尤為不利；教育當局如果不投放資源擴展高等教育，每年收生人數維持不變的話，為數眾多的高中畢業生所面對的升學競爭將更激烈，何況還要應付從三年制改為四年制所增收的學生！一般人還忽略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在新舊學制交替進行的情況下，本港的大學需要更多人手和資源，始可應付 2012 年至 2015 年間的過渡期。具體地說，大學必須在 2012 年既取錄新制（四年制）一年級學生，同時又取錄最後一屆的舊制（三年制）一年級學生，舊制大學生要到 2015 年始全部畢業離校。（表一）

1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香港：教育統籌局，2005 年 1 月），頁 30。

2 同上，頁 153。

表一 新舊學制過渡時間表

學年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舊 學 制	中 7	大 1	大 2	大 3			
	中 6	中 7	大 1	大 2	大 3		
	中 5	中 6	中 7	大 1	大 2	大 3	
新 學 制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大二	大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大二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二、中學歷史科的改革

爲了配合新學制的實施，現行爲中四、中五學生而設的中學會考科目，都會在原有的考試範圍之外，相應增加約三分之一的課程內容。以中國歷史科爲例，現有課程將列爲（I）「歷代發展」，包括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和乙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新增內容列爲（II）「歷史專題」，包括六個單元：（1）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2）地域與資源運用，（3）時代與知識分子，（4）制度與政治演變，（5）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6）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³

「歷代發展」屬必修內容，甲部、乙部都要讀；「歷史專題」則爲選修，學生在六個單元之中，只選讀兩個單元就可以了。另外加入「中國歷史概論」及「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前者應在高中一年級中國歷史科開始學習時先行作扼要而概略的處理，後者則可於高中一至三年級期間配合課程進度施教，但兩者均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⁴ 按照中史科建議教學模式（表二），並參照中史科學習時間分配（表三），教師和學生應以兩年半時間完成課程，然後於高中三年級下學期準備公開考試。

3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中國歷史科（課程部分暫定稿）》（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2006年1月），頁22。

4 同上，頁35-36。

表二 中史科建議教學模式

高中一年級			高中二年級			高中三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暑假	上學期	下學期	暑假	上學期	下學期	暑假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試前準備 及 參加 考試																
中國 歷史 發展 概論	(I) 歷代發展 甲部／乙部 〔依時序設計〕			(II) 歷史專題 單元 A／單元 B 〔主題式設計〕																			
校本評核：準備————→ 實施 —————→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表三 中史科學習時間分配

教學構成部分	建議課時 (小時)	備註
(I) 中國歷史概論	8	引論和學習基礎，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II) 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	15	貫串整個學習過程， 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
(III) 歷代發展 1、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2、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140 (70) (70)	公開評核範圍， 全部項目必讀
(IV) 歷史專題 1、單元 A 2、單元 B	80 (40) (40)	公開評核範圍， 選兩單元修讀
(V) 其他學習活動	27	鞏固學習根基， 提高對本科的興趣

中史科的課程理念有四：第一是文化傳承，使學生認識和關心國家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並探索未來發展；第二是國民教育，使學生增加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了解本身的文化傳統並培養恢宏的世界觀；第三是學會學習，使學生懂得運用歷史思維，對社會現象

和世界問題進行獨立的分析和判斷；第四是持續發展，務求令學生提升思辨能力和養成良好品格，為日後的發展奠定基礎。

具體地說，中史科的課程目標有三：（一）建構歷史知識，相當於知識論，亦是古人所說「史家四長」中的「史學」；（二）掌握研習技能，相當於方法論，亦即「史才」；（三）培養積極態度，相當於人生觀，亦即「史德」。三者互相配合，就可養成「史識」。「史家四長」之中，史才相信部分來自天賦，後天的培育亦很重要；史學要靠努力和積累才有堅實的根基，有沒有好的學習方法是關鍵所在；史德與一個人的才學和品格息息相關，是為學與做人的至高原則；史識最難養成，也最不容易判別和衡量。

歷史科（世史）的課程目標，是要使學生建立知識、掌握技巧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課程內容亦分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包括引言「現代世界的孕育」、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和主題乙「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選修部分包括三個項目，即「比較歷史」、「歷史議題研究」和「本地及文化傳統研習」，旨在培養學生某一類型的概念與智能，學生須選擇其中一項。⁵

新高中兩個歷史科的課程各有特色，大體來說，中史科重視縱的傳承，世史科注意橫的聯繫，可以彼此配合和互補。⁶ 文科學生如果能夠同時修習兩科，是理想不過的；但因學校的安排的取向各不相同，相信大多學生只能選讀其中一科。所以，要高中階段達成歷史教育的宗旨，在制度下有一定的難度，只能寄望教師因應各校的安排作出調整。

三、歷史教學的態度和價值觀

課程改革的最大宗旨，是進一步發揮歷史教育的功能。以中史科為例，首先是使課程更完善，「歷代發展」宏觀而有重點，「歷史專題」多元且有新意；其次是改進教與學，包括加強探究式學習和掌握基本方法學；還有，就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除了加強課堂研討外，應鼓勵參加課外活動，以及養成課外閱讀習慣。至於歷史科（世史）的主導原則，是要突顯主要的發展趨勢及歷史概念，並且介紹不同的歷史研習方式，包括比較歷史、歷史議題探究、本地及文化傳統研習，養成處理當代課題的能力及技巧。

問題在於兩科的選修部分都列出多個項目，學生只選其中部分課題，中史科六個單元只讀兩個，世史科三項只擇其一，學生之間的差異性太大，一方面會造成訓練不夠整全，另一方面會為大學歷史系帶來困難，因為新生入學時缺乏共同的知識基礎。

對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的探索，論者已予指出：「在進行歷史教學中的寓德教育時，還應注意歷史學科在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特殊地位、歷史教學的特點和我們的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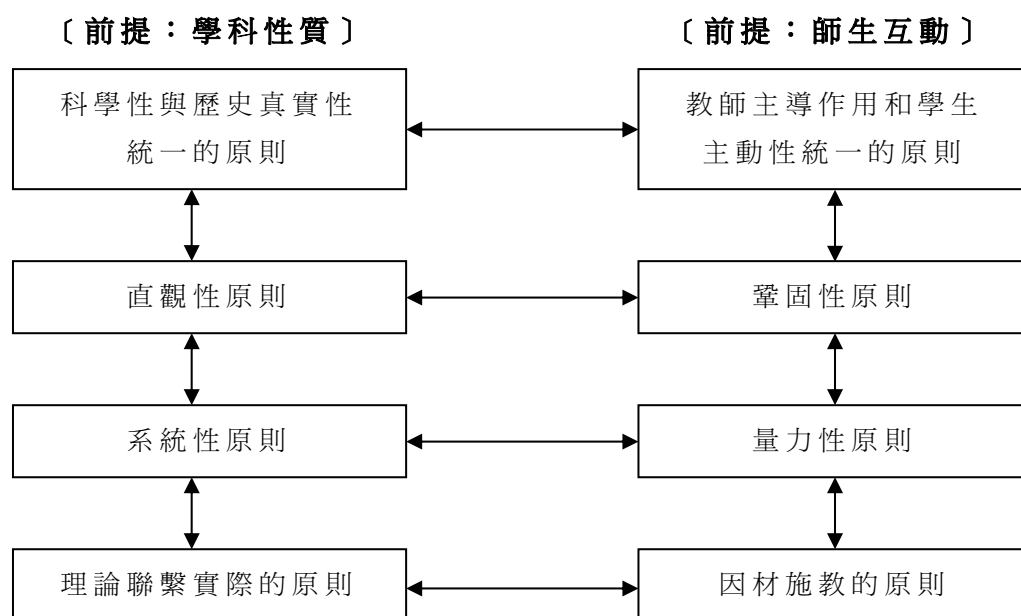
5 《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歷史科（第二次諮詢稿）》（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2005年5月），頁2-11。

6 周佳榮〈歷史教育新方案——回應知識時代需求的課程和訓練〉，載方駿主編《新世紀的歷史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年），頁105。

育對象——學生的心理特點和發展水平，遵循以下原則。」這些原則，包括科學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層次性原則和情感性原則。⁷ 還要特別重視對學生品德發展教學策略的幾點思考：一、遵循學生品德心理發展的實際，以「導」代「灌」；二、注意在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過程中學生的積極參與、發揮教學民主；三、情感和理性要結合；四、要採用多樣的形式和渠道；五、注意適當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動」「靜」結合。⁸

與此同時，必須兼顧中學歷史教學的主要原則，包括：科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統一的原則，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動性統一的原則，直觀性原則（需要以感性知識和經驗為基礎），系統性原則（縱的系統關係與橫的聯繫），鞏固性原則（幫助學生掌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量力性原則（可接受性），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表四）；「好的教學效果，是全面地貫徹這些原則的結果。切不可在實際工作中片面地、不恰當地強調某個原則，而忽視或降低其他原則的作用，那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的。」⁹ 為了達成上述的宗旨，歷史教學新方法的探索和安排相關活動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表四 中學歷史教學的原則



7 張靜、李曉風、姚嵐、孫楠著《歷史學習方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43-44。

8 同上，頁51-54。

9 于友西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93-99。

四、歷史教學的方法和相關活動

探索歷史教學的新方法，首先要確立方向，就是如何從直觀教育進展到啓發式教學，於此宜注意三事：一是板書技巧的發揮，二是影像教學的運用，三是立體效果的塑造。其次，教師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駕馭和超越考試的新思維，可舉的例子有三：其一，是注意人物研究，使學生增加對社會發展的關懷；其二，是釋放空間，適量地重視文化史有助於擴寬歷史視野；其三，是採用校本評核，發揮學生的創意。

爲甚麼要注意板書、影像教學和立體效果？原因很簡單，根據驗證結果，人們通過各種感官獲得知識的比率以視覺最高（83%），聽覺次之（11%）；視聽並用的記憶保持比率在上課當時可達 90%，三日之後仍有 75%；如果單憑聽覺，在三個小時內的記憶保持比率只有 60%，但三日之後，只賸下 15%。（表五）¹⁰

表五 獲得知識和保持記憶概況

●A. 通過各種感官獲得知識的比率：					
感官	(1) 視覺	(2) 聽覺	(3) 嗅覺	(4) 觸覺	(5) 味覺
比率	83%	11%	3.5%	1.5%	1%
●B. 感官獲得知識的記憶保持比率：					
記憶保持比率 學習方式		約 3 小時		3 日之後	
聽 覺		60%		15%	
視 覺		70%		40%	
視聽並用		90%		75%	

此外，教師亦應注意學生對歷史教學內容的興趣程度，哪些是感到興趣的，哪些則不感興趣。具體地說，初中學生感到興趣的課題包括：（1）重要戰役、戰爭和事變；（2）歷史人物介紹；（3）歷史事件經過；（4）中國文化成就；（5）歷史之謎和奇聞趣事；（6）科技發明創造。初中學生不感興趣的課題，包括：（1）歷史年代、人名、地名；（2）各種會議或條約的內容；（3）各種事件的意義；（4）政治方針及其評論；（5）典章制度。高中學生的興趣不如初中學生那樣明顯，多數對政治、經濟、文化內容、歷史人物的價值觀及歷史的經驗教訓等問題更感興趣，並且更樂於從歷史與現實的聯繫上來探索問題，這種探索興趣已顯露出責任感和求異思維的特點。（表六）

10 張保華主編《中學歷史教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01。

表六 中學生對歷史教學內容的興趣

	初中學生	高中學生
感到興趣	☆重要戰役、戰爭和事變 ☆歷史人物介紹 ☆歷史事件經過 ☆中國文化成就 ☆歷史之謎和奇聞趣事 ☆科技發明創造	☆興趣不如初中學生那樣明顯 ☆多數對政治、經濟、文化內容、歷史人物的價值觀及歷史的經驗教訓等問題更感興趣
不感興趣	☆歷史年代、人名、地名 ☆各種會議或條約的內容 ☆各種事件的意義 ☆政治方針及其評論 ☆典章制度	☆更樂於從歷史與現實的聯繫上來探索問題，這種探索興趣已顯露出責任感和求異思維的特點

至於教學模式，一般可採用的有兩種：首先是最傳統的「講解——接受」的教學模式，基本上包括感知、理解、鞏固、運用、評核五個步驟。（表七）其好處是學生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系統的知識，當教學進度面對時間緊迫和考試壓力時尤為有效；但應藉啟發式講授作出改善，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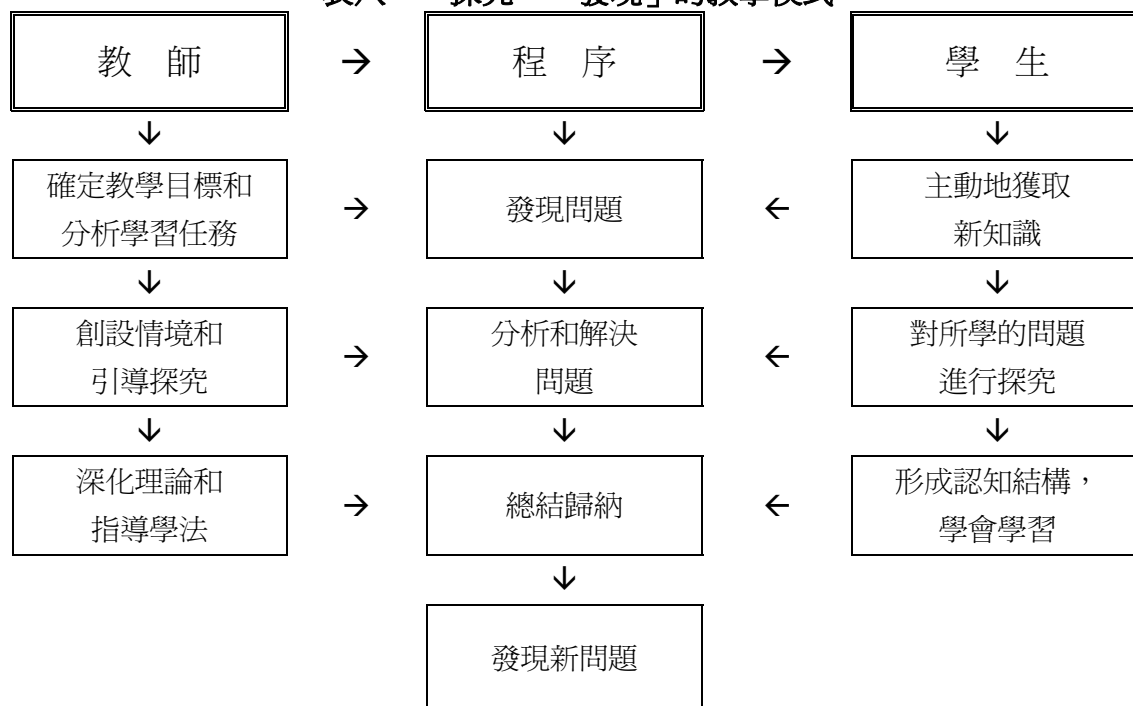
表七 「講解——接受」的教學模式

1. 感知	⇒	2. 理解	⇒	3. 鞏固	⇒	4. 運用	⇒	5. 評核
認識的感性階段		掌握規律性的歷史知識		提高興趣、信心和記憶能力		培養自學和觀察、分析能力		檢查、評估和考核

其次是「探究——發現」的教學模式，主要步驟包括：一、明確並陳述教學目標；二、分析學習任務；三、選擇教學方法與教學媒體；四、評價學習結果。（表八）¹¹ 其好處是培養學生的歸納思維能力，從已知的事實或現象中推導出未知，從中發現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性。但這種教學模式尚待改善，因為培養學生邏輯思維的能力也很重要。

11 討論歷史教學模式的著作很多，趙亞夫著《中學歷史教育學》（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7年）、吳翎君著《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等都方便參考。

表八 「探究——發現」的教學模式



教師宜因應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教學模式。最合適的建議，莫如採取以下方法：（一）以直接教學模式為基本：教師先提出一個概念，再加以詳細的解釋，向學生傳播知識，因為這一模式是最經濟和有實效的。（二）注重探究式學習：讓學生先通過獨立的思維活動，從中「發現」概念，由於歸納思維在人類認識史上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這種方法是正確和有意義的。（三）兼採其他教學模式：例如「合作教學模式」，這是對學生小組學習方式的指導性應用；或者「範例教學法」，使學生借助精選的教材，通過與「範例」的接觸訓練和培養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總之，傳授知識、訓練技能、培養道德品質、提高美學修養、養成高尚人格等，都是歷史教學的重要任務，教師本身對學生起著示範作用，所以教師的學問、品格和人生觀關係至大。以身作則未必是最好的教學法，教師個人表現對學生的影響卻是明顯可見的。

課室內主要的教學法，不外乎講述法、解讀法、談話法、綱要圖示法、教具展示法等；至於輔助教學法，則宜考慮多媒體技術的應用、網路教學，戶外教學和參觀（博物館、文物徑等），以及口述歷史的進行等等。¹²

12 周佳榮〈中學歷史教學及研究的新方法〉，梁炳華主編《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2004年），頁57-58。

五、階段性學習及其銜接問題

在新學制之下，歷史教育分成初中、高中、大學三個階段進行。以中史科為例，可以清楚看到三個階段的發展。(表九)初中的對象原則是全體學生，高中的對象主要是文科學生，大學的對象則是歷史主修生和部分副修、選修歷史科目的學生，但三者有承接和深化的關係。尤其是高中與大學之間，必須考慮到銜接問題。

表九 中史科的三階段學習

階 段 要 項	初 中	高 中	大 學
中史課程內容	• 政治史 • 文化史	• 歷代發展 • 歷史專題	• 中國通史 • 專門歷史
歷史研究能力	初步培養學生認知、理解、觀察、分析等基本能力	鞏固研習歷史的基本能力，並訓練學生啟疑、批判、評鑑、反思、辨偽等思維能力	綜合運用各種專門的史學方法
價值觀與態度	培養良好的個人操守，對團體和社會的責任感，建立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感	深化初中基礎，並培養尊重史實、接納不同意見等客觀態度	客觀的態度，專業的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

高中畢業生而希望專攻歷史的話，現時香港八所大學之中，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都設有歷史系，樹仁大學歷史系最近亦已開辦學士課程。選讀中國歷史科、歷史科的高中畢業生，亦可考慮進入大學的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及傳理學院。

主修歷史的就業出路是很廣泛的，包括學術研究、教育工作、編輯出版、文物保育、考古發掘、檔案管理、文博展覽、文化旅遊、新聞傳播、資訊科技、工商企業等等。史學方法不單類近做人處事的方法，與知識管理的原理基本上是一樣的，歷史是一門歷久常新並且饒有效益的學科，其重要性在以往固然備受肯定，在今日以至未來，更是知識型社會所不能或缺的。

【作者簡介】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保良局文獻回顧與研究概況

丁 潔

一、引 言

香港的保良局創辦於 1878 年，¹ 自成立之初，就已有了特定的宗旨和針對性，即保護和收容被拐騙販賣的婦孺。其時中國人民多貧苦不堪，生活困窘。一些不法之徒於是以僱傭為由，將良家婦女誘拐至香港，或逼良為娼，或將其販賣出境，以謀暴利。鑑於拐賣之風日盛，幾位東莞籍商人，包括曾任東華醫院總理的盧賡揚（禮屏）、金山莊商人馮普熙（明珊）、施笙階、謝達盛等人於 1878 年 11 月 8 日聯名向港府提議，成立一個專司其職的“華人保良局”。² 後經港督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核准，命名為“保良公局”（即現時的保良局）。早期保良局的宗旨是“保赤安良”，其工作以處理夫婦爭執、家庭糾紛、迷途童婦、過埠婦女、已註冊及未註冊婢女、私娼及買賣人口等事務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社會的日益安定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拐賣婦孺的行為逐漸絕跡，新的社會需求應運而生。保良局作為最早建立的華人慈善機構之一，其舊有的服務內容亦隨之發生改變。在新的歷史時期，保良局開始發揮新的社會功能和承擔起新的社會角色，以至於今，成效卓著。戰後保良局的發展，已有逾六十年的歷史，就有關文獻著作加以整理，從而作出相應的研究，實具重要意義，並且有其迫切性。

1 關於保良局的成立日期，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最初由幾位華商聯合向港府建議成立專責機構是 1878 年 11 月 8 日，其後保良局確定 1878 年為創辦年份，11 月 8 日為成立紀念日。1880 年保良局始以公司之名註冊成立，但並未如東華醫院一般，獲納入社團法例。直至 1893 年，《保良局組織條例》制訂頒佈，次年該條例獲藩政院批准刊於《香港政府公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保良局才正式由立法局立案，確認其法人地位。因此，有些學者認為 1893 年保良局才正式成立，或認為保良局在 1893 年立案以前，只是東華醫院的一個分支機構或附屬團體。本人認為保良局自 1878 年起，雖未獲立案，但有關工作已用保良局名展開，以 1878 年作為保良局創辦年份是合理的。

2 保良局文獻：呈文（1878—1881），1878 年 11 月 8 日；“To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HKGZ)* 1880, pp. 103-105.

二、記述保良局歷史的專著

目前坊間可以找到的涉及保良局的文獻資料相當多，但學術性的研究著作則仍較為缺乏。保良局建立後，因其特殊的功能而在香港社會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提起以“保赤安良”為宗旨的保良局，恐怕鮮有人不知。研究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葉的香港，往往不能不提及保良局，它的存在已經與當時的香港社會密不可分。因此，許多關於香港史的書籍都會為保良局留有一席之地。但書中對保良局的介紹，通常都十分簡略，將重點放在保良局建立的緣由和經過，及其在保護婦孺方面的主要成績，而對其他方面的工作和保良局日後的發展，或忽略不提，或一筆帶過，一般較少述及。

此外，以保良局為主題的專著也很少見。現時僅有的幾本，多集中於研究保良局早期歷史，對保良局後期發展提得較為簡略。敘述保良局歷史的專書，主要有兩種。首先是《香港保良局史略》由保良局丙午年（1966-1967 年）主席方潤華主持編纂，於 1968 年出版。時正值保良局成立九十周年，方潤華在序言中指出，編纂此書是為了尋源溯本，提要鉤玄，述其沿革，載之篇章，亦不乏珍視昔日文獻及表彰前賢勞動之目的。³ 該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包括人物、建築照片，歷史圖片，碑記聯額大事掌故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分別是保良局九十周年史略、保良局大事年表和保良局文獻彙輯。史略部分記載了保良局自創立以來九十年的歷史，包括創局緣起、組織制度、局址沿革、經費來源、主要工作及其設施、當屆總理措施以及今後展望等，並將保良局的發展軌跡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 1878 年保良局初創至 1891 年該局有獨立局址為止，是為成立初期。其時保良局以防範拐誘、調解家庭糾紛為主要使命，最初借東華醫院“平安”、“福壽”兩樓辦公兼收容婦孺；自 1891 年得廣義祠地段第一次遷建局址後，收容婦孺人數增加，其組織系統也確立完備。第二個時期由 1891 年至 1945 年，其間該局處理的婦孺案件日益增多，原有局址不敷收容，故於 1930 年再遷局址於禮頓道，同時亦獲政府每年七千元的津補。1938 年，政府津貼增至一萬五千元，並於 1939 年批准該局每年賣花籌款。保良局開始進入穩步發展階段，工作範圍也日益拓展。第三個時期是 1945 年以後。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統治之後，香港的社會情況發生轉變，但社會問題仍然嚴重。保良局除繼續收容婦孺外，亦開設學校教育和職業訓練班，使婦孺身處其中，建設日多。⁴

保良局大事年表記載的時間從 1898 年至 1968 年，分為西曆年份、農曆年份、當年總理、大事記數欄。⁵ 該年表依據歷年《局志》和早年與官方來往之書割，“勾稽載籍，擇其可紀者表而出之”。⁶ 保良局文獻彙輯則收錄了部分保良局重要的文獻資料，如最初遞

3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香港：保良局，1968 年），第 1 頁。

4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第 43-44 頁。

5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第 211 頁。

6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第 277 頁。

交港督的呈文、政府致該局的信函、與其他華人團體來往的書信、籌款的文獻等等。⁷

其次是《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在前書的基礎上增添補漏，於 1978 年出版，作為保良局成立一百周年誌慶。其佈局與前書大致相同，分為三部：第一、概述百年來之發展；第二、縷陳在進展中之工作及展望今後之服務；第三、彙輯百年來之珍貴文獻及史料，載之篇章，以垂永久。⁸ 在述及保良局發展歷史時，該書自前書的第三時期中分出第四時期，而以保良局修改局章作為第四時期的開端。1971—1972 年，該局的首總理名稱改為副主席，同年即修訂已有七十四年歷史的局章。1973 年 12 月 14 日，港府憲報公佈《保良局 1973 年法案》並開始實施。至此，保良局的組織與編制由於歷史性的改革，換上嶄新的面目，揚棄了七十四年前所訂立的、不切戰後實際環境的局章。⁹

此外，還有兩種紀念特刊值得注意：其一是《保良局百一週年紀念特刊》（1989 年）¹⁰；其二是《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1998 年）¹¹。連同保良局文物館、李秀娟等編纂的《香港保良局教育服務五十年》（1997 年），可以藉以認識保良局一百二十年來的發展概況。曾鳴整理〈香港保良局史略〉（載《廣東文史資料》第 61 輯，1990 年），也很方便參考。

三、保良局的檔案資料

研究保良局的歷史，不能不提到日本學者可兒弘明撰寫的《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¹² 此書以香港保良局文書作為基礎資料寫成，為國際學界所矚目，原著為日文，由孫國群、趙宗頗譯成中文出版。該書的直接研究物件是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30 年代的海外中國娼妓，即廣東方言裏所稱的“豬花”，據此系統闡述了賣“豬花”的歷史背景、始末、規模和人員結構等，又從考察近代中國東南沿海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社會觀念、香港地位作用的演變等入手，多層次多角度地剖析了產生販賣婦女現象的經濟原因和社會原因。¹³ 該書主要分為四部分：一、苦力貿易與“豬花”；二、“豬花”南航始末；三、妹仔制度和四、“豬花”；救濟的理論與實際情況。之所以要在講到保良局歷史時提及這樣一本書，不僅因為該書論述了保良局的建立及其在“豬花”問題中所擔當的角色，更主要的原因是該書還是除了保良局的出版物以外，最早利用保良局檔案寫

7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第 219-231 頁。

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1978 年），第 1 頁。

9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 136 頁。

10 此書中英對照，英文書名為：Po Leung Kuk 110th Anniversary Report (Hong Kong: Po Leung Kuk, 1989)。

11 此書中英對照，英文書名為：Po Leung Kuk, 120th Year Special Edition (Hong Kong: Po Leung Kuk, 1998)。

12 可兒弘明：《近代中國の苦力と“豬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 年）。

13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11 頁。

成的專書。著者在利用保良局檔案時，這批檔案還未經整理，或者可以說是仍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正是由於該書的出現，使得學界認識到保良局檔案的價值。此後在香港學者冼玉儀的鼓勵和推動下，這批檔案得以被整理及固定存放。¹⁴

可兒弘明在其書中，對保良局的檔案作了扼要的介紹。當書中提到，保良局收藏了晚清時期從光緒八年（1882 年）到宣統三年（1911 年）的文書 115 劄、從中華民國成立到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文書 155 劄，總共 270 劄。關於保良局和保良事業的一些情況還可以查閱其他各種資料。其中有保良局每年發行的《徵信錄》，後來由《保良局年刊》代替。除《徵信錄》外，還有香港政府發行的《香港轅門報》，該報第 28 卷第 33 號所載的憲法 318 號中，公佈了保良局條例 17 條；此外，在以後的各號中，還公佈了保良局新任理事的姓名、收支報告、內容人數等。關於保良局社團法人的問題，可以在立法會評議會議事記錄的《香港會議文件集》的資料裏看到。¹⁵

另外，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葉漢明也亦撰寫了一些介紹保良局檔案的文章，包括〈香港婦女史原始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¹⁶、〈保良局檔案與香港婦女史研究〉¹⁷、〈香港社會檔案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¹⁸ 等，內容較側重婦女史研究方面。

歸納起來，這批保良局的珍貴檔案大致可分為：呈文、信件往來類、誌事錄類、議案簿類、人數簿類、登記簿類、口供簿類、徵信錄類、年刊及特刊類、記數簿類和其他。（附表）

附表 保良局檔案資料分類表

類 別	細項及年份
1. 呈文	1878—1881
2. 信件往來類	華民政務司來往信簿 1884—1952；各埠來往信簿 1887—1941；誌事錄 1887—1955

14 葉漢明：〈香港社會檔案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香港檔案學會通訊》第 1 期（2000 年 1 月 1 日），第 5-12 頁。

15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第 57-72 頁。

16 葉漢明：〈香港婦女史原始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性別研究資訊》創刊號（1991 年 3 月），第 2-3 頁；亦載氏著：《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第 307-317。

17 葉漢明：〈保良局檔案與香港婦女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6 期（1998 年），第 205-212 頁。

18 葉漢明：〈香港社會檔案資料介紹——保良局檔案〉，《香港檔案學會通訊》第 1 期（2000 年 1 月 1 日），第 5-12 頁。

3. 議案簿類	議案簿 1880—1967；各處建醮助局費議案簿 1928；議事錄 1943—1947；董事局庶務部議案簿 1952—1955；平民義校學務委員會議案簿 1953—1960；總理庶務部議案簿 1959—1960；保良局總理聯誼會學校議案簿 1960—1967；建校委員會議案簿 1961—1962
4. 人數簿類	留局婦孺人數簿 1928—1959；留局兒童人數簿 1942—1945；留局婦孺分類人數簿 1947—1950；婦孺名列 1929—1933
5. 登記簿類	留局婦孺案 1934—1941；收容婦孺名冊 1944—1967；立領帖 1920—1938；難民登記簿 1884；本港英憲並各埠發來難民登記簿 1885—1887；領婚登記(附領育)1885—1937；難婦孺出局登記簿 1954—1956；各案分類登記簿 1936—1937；入局婦孺登記簿 1954—1956；留醫婦孺登記簿 1958—1959
6. 口供簿類	各署、各埠本局分發難民簿 1882—1895；政務司發放男女難民口供簿 1891—1955；口供暫記 1892—1912；外來口供簿 1893—1946；訊問男女童 1947—1948；覆訊婦孺口供簿 1950—1951
7. 徵信錄類	徵信錄 1904—1950
8. 年刊、特刊類	年刊、就職特刊 1947—2007；保良局周年特刊 1948—2007；新建設、服務特刊 1966—2004；屬校特刊 1967—2007；慈善籌款特刊 1967—2007；訪問團特刊 1968—1994；屬校周年特刊 1976—1990；其他刊物（不包括書籍）1947—2007
9. 記數簿類	進支簿 1887—1960；薪酬簿 1907—1966；來往數登記 1911—1930；來往數年總結簿 1915—1950；來往數結簿 1917—1943；恩俸簿 1923；遷建保良局勸捐緣簿 1930；婦孺度歲飲食支數簿 1932；進支分類簿 1936—1951；進支草簿 1936—1954；司庫收數登記簿 1937—1938；銀行來往簿 1940—1950；建築來貨簿 1941；建築進支簿 1941—1949；代胡文虎收容兒童來往數簿 1942—1945；保良局年結 1944—1947；進支分類總結簿 1945—1950；榮豐行代收局款舊記簿 1951；保良局帳房與義務司庫榮豐行來往銀兩 1951；進支總結移交數簿 1952—1964；平民義校進支簿 1953—1963；歷屆總理聯誼會小學進支簿 1963—1969
10. 其他	交接存件簿 1901—1966；連任存件簿 1942；點存物件簿 1942；印信契據存件交代簿 1952；保良局同人芳名錄 1881—1894；嘉賓題名錄 1924—1996；歷屆總理聯誼會名冊 1949—1957；巡局簽名簿 1969—1996；保良局服務介紹 1965—1998；新聞剪報 1977—1998；相片類 1896—2000

資料出處：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www.poleungkuk.org.hk/museum/index.htm>.

保良局早於 1979 年開始，便有意識地就該局內的文獻資料作整理和保存，並於 1980 年闢專柜加以收藏，1980 年成立保良局文物室，1996 年建為文物館，1998 年裝修後開放予市民參觀。¹⁹ 現時並有網頁供參考。²⁰

四、有關保良局的學術論著

英文著作方面，多注意保良局在戰前的結構、發展及演變等。²¹ 前文提及的學者冼玉儀亦利用保良局的檔案寫成關於東華醫院的英文專著《權力與慈善：香港東華醫院的早期歷史》²²，及論文〈十九世紀香港的父系家長制與婦女保護〉等²³。其他學者利用這批檔案寫成的論文的，還有：鄧詠宜〈東華三院對早期香港社會的影響（1869 年至 1896 年）〉（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歷史學專業論文，1996 年）、鍾玉婷〈香港妹仔問題與保良局的成立〉、鍾潤蘭〈香港保良局領婚制度研究（1896—1914）〉、吳琰玲〈早期香港華人蓄婢觀〉、潘佩婷〈對抗與和解：香港妹仔問題（1901—1940）——以保良局的角色為重點〉²⁴、施琳〈香港妹仔制度（1878—1929）〉²⁵等。葉漢明〈慈善活動與殖民主義——香港早期的保良事業〉（載張學明、梁元生主編《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5 年），尤為值得注意。

【作者簡介】丁潔，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課程研究生。

19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考察香港——文化歷史個案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05 年），附錄一，頁 289。

20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www.poleungkuk.org.hk/museum/index.htm>。

21 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5) 或其中譯本：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H.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 Elizabeth Yuk Yee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 Elizabeth Yuk Yee Sinn, "Chinese Patriarch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Maria Jaschok and Suzanne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 Poon, Pui-ting, *Confron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Hong Kong (1901-1940),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Po Leung Kuk*. M.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25 *Mui Tsai in Hong Kong (1878-1929)*.

◆ 人物研究 ◆

陳婉衍與清末民初上海愛國運動

黃 嫣 梨

一、引 言

清末民初的上海，為培育早期革命女傑的重要搖籃之一，各類的婦女報刊、女學堂或革命的籌備都以此為基地，這與其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歷史契機有關。由於上海擁有控江踞海的地理位置，能締造出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早在明朝萬曆三十一年（1603 年）天主教已傳入上海，徐光啓曾邀請意籍傳教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 1560-1640）到上海開教，並在此引進西方文化。¹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開埠以後，上海纔正式成為近代中國接觸西方文化的一個戶牖戶。

在這樣的環境下，早在 1850 年美國教士裨治文夫人（Mrs. Bridgeman）於上海設立裨文女塾，此乃全國第二所女校。這無疑跨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門檻，突現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實言之，隨著局勢的動盪，西潮的闖入，牽動著一批富有新思想的男女知識份子，開始反思一些對女性的苛厲封建戒條。另外，更喚起女子對新世代與國際情勢的關注，在這種中西文化、價值觀念相互之角力下，孕育了一群如陳婉衍（生卒年不詳，約於清末至民初，主要活動於上海）中西兼融的革新女性，她意識到女學與國家富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創辦愛國平民學校，衝破社會階級的藩籬，喚起各個階層的婦女去關心國家大事，帶領她們參與反帝愛國運動和反清的民主革命，並鼓吹透過暗殺達至國家振興。陳婉衍的貢獻在於她率先在上海自資創辦愛國女學堂，培養一批愛國女志士，努力不懈參與民族運動，如拒俄運動和南京光復等，拓闊婦女的視野及改變婦女的社會角色。

可惜近人對其研究不深且缺乏系統性，故本文主要從清末民初的書報中，如《俄事警聞》、《警鐘日報》、《民立報》、《中外日報》和《神州日報》等，探索和整理有關陳婉衍的資料，聯綴成篇。文章的結構乃以陳婉衍的事蹟為縱面，再配以近代上海的婦女愛國運動為橫面，全面剖析陳婉衍在近代上海的婦女愛國運動中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及其貢獻。

1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5），頁 80-84。

二、陳婉衍的生平事蹟

關於陳婉衍的生平，湮不可考，因此未能確實考證陳氏的生卒年份，從有關文獻得知她在清末民初活躍於上海的教育界。只知她“自幼守志，好學不倦，近著有宗孟課本三編；初編造句，二編問答，三編論說，詞意簡要”²，從上文所言，窺探出陳婉衍從小就堅守其志向，篤學勤奮，為她日後的辦學奠基。在1903年，陳婉衍在上海大南門外自資創建宗孟女學堂，並著有宗孟課本，此書為“世界唯一之大議論，大見解”³，反映其頗富才華和識見。該校之辦學宗旨，與當時思潮相互呼應，她以“辨種族，尚氣節”為宗旨，辦學以來，一直倡議民族主義，以著重精神教育。⁴

在1903年11月，陳婉衍在宗孟女學堂內設對俄同志女會，至1904年2月，對俄同志女會改名為慈航社；此會籌集款項，擬定章程，所舉議長、議員皆為女士。⁵該會自成立以來，開會數次，公推陳婉衍、鄭素伊、童同雪三人為總議事，鄭女士更獨力捐銀三千為會費，然對於其金錢來源無從考得。⁶爾後陳婉衍又開會擬定在宗孟女學堂內創設赤十字會，並開會草擬行事細則，如在校內添設醫學科，聘醫學女教師來講授速成醫學及購辦醫學傷藥備用等，“謂中國一旦有事，願赴戰地云云”。⁷

武昌首義成功以後，南北對峙局面初成，而各省也紛紛進行光復起義的抗爭。光復會北伐軍總師令李燮和授命陳婉衍為女官招募和組織女子北伐光復隊。1911年11月16日，陳婉衍在《神州日報》上發表〈女子北伐光軍招募通告〉，號召女子投軍從戎，速至吳淞軍政府報名。招募廣告發佈不久，“女子投效者有七八十人之多”⁸，其中有50人組成女子北伐光復軍，並於1911年11月21日在吳淞軍政分府聚集，定於11月23日開會⁹。不久，因南北議和告成以後，女子光復軍也被迫解散，北伐之舉亦因此作罷。在1912年，臨時政府撥資在南京建設復心女學校，以安撫女子軍。¹⁰

2 〈宗孟女學堂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年3月28日。

3 〈宗孟女學堂〉，《警鐘日報》，1904年3月2日。

4 〈宗孟女學堂之特色〉，《警鐘日報》，1904年9月8日。

5 〈對俄同志女會廣告〉，《俄事警聞》，1904年1月22日。

6 〈宗孟女學堂第三次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年9月9日。

7 〈對俄同志女會之議案〉，《俄事警聞》，1904年1月26日。

8 〈女子北伐光復軍招募通告〉，《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

9 〈女子北伐光復軍開會通告〉，《時報》，1911年11月21日。

10 〈南京復心女學校特別廣告〉，《民立報》，1912年3月16日。

三、陳婉衍與清末民初的上海婦運

1. 創辦“愛國”女學堂——宗孟女學堂

隨著民族危機的日深和農業經濟漸趨衰落，促成以男性為主導的封建宗法社會逐漸崩潰，近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因而得到空前的重視，她們更成為革命者爭相招攬的對象，“母教”也開始備受注視。然此時的女學非純為知識的承傳，而是傾向透過教育增強婦女的民族使命感和愛國激情，從而推動她們投身“救亡圖存”的行動。在上海的婦女傾力籌辦書報，倡導女學、宣揚革命思想，如陳擷芬的《女學報》、秋瑾的《中國女報》等。

在 1903 年，陳婉衍率先在上海自資創建愛國女校——宗孟女學堂¹¹，並擬定學堂新章程，這所學堂較之清廷所頒佈的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章程¹² 早了四年，頗具開創風氣之先。此校的宗旨素來以激烈為聞¹³，以倡導民族主義，及崇尚氣節為砥礪，教師多為革命女志士。在 1904 年之〈宗孟女學堂第三次新章程〉中擬定教育宗旨，與陳婉衍的主張相互配合：（一）如貞節貧苦，本校不但免其學費，且格外推重；（二）本學校經費，由總經理（陳婉衍）一力承擔，不外勸募分文；（三）本學校經理及教習等，既以平等之禮待學生，學生亦宜深體此意，諸事誠敬自愛；（四）衣飾純樸、不施脂粉及纏足。¹⁴ 學制章程之擬定有助於教學上運作，教學漸趨系統化。

另一方面，陳婉衍的主張也吸引了其他女子參與該校所辦的講會、紀念會等。譬如林宗素（1878-1944）於 1904 年參加宗孟女學堂殷孝烈紀念會，而該紀念會除講述殷孝烈殉難事外，還論述朝政的腐朽和拒俄等問題。¹⁵ 開學至今，成績顯著，“聞今秋開課後，入學之人益增”¹⁶，“本年正月以來海內外來書已有三百八十餘函皆荷極口稱頌本校，雖不無溢美之愧，而亦藉以自證宗旨之不謬已有公論。”¹⁷ 鑒於來學者眾，寄宿舍已住滿，故在六月份開會擬定建造大洋房以擴建校舍。¹⁸

由於陳婉衍以提倡民族主義為宗旨，故校內的排滿氣氛也相當熾烈，女學生皆熱忱於政治議論，“女士等雖係巾幗，而深以中立騎牆，束手待亡為可恥，深以名則中立實

11 宗孟女學堂命名為「宗孟」，因“本學校本以孟子「民為貴」一語為宗旨，故曰「宗孟」”，詳見〈宗孟女學堂第三次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9 日。

12 有關章程的內容，可參見〈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東方雜誌》，1907 年 4 期，頁 9277-9287。

13 〈女界之光〉，《警鐘日報》，1905 年 1 月 18 日。

14 〈宗孟女學堂第三次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9 日。

15 〈記宗孟女學堂殷孝烈紀念會〉，《警鐘日報》，1904 年 4 月 4 日。

16 〈宗孟女學堂之特色〉，《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8 日。

17 〈宗孟女學校總經理陳婉衍〉，《警鐘日報》，1904 年 5 月 13 日。

18 〈宗孟女學校特啓〉，《警鐘日報》，1905 年 1 月 12 日；另可參見〈宗孟女學堂第三次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9 日。

則並無中立之勢力爲可恥。”¹⁹ 宗孟女學堂的學生常抨擊時弊，如開會提議萬福華、俄水手案，及粵漢鐵路事²⁰，雖然鮮見付諸實踐，然而“政治思想油然而生，即他日中國女子救國之機也。”²¹ 女子議政的舉動無疑已衝破了禁錮女子問政的牢籠，實踐了女子個性的解放和表現女子對國事的關注。

在課程的編排上，陳婉衍所辦之宗孟女學堂，其課程和治學理念充分展現出近代教育的方向和治學模式。其治學理念和課程乃中西兼融，有強調個人懿德的校風，如推崇貞節貧苦婦女入學，且免其學費，及有崇尚氣節的修身學科；也順應時代的需要而開設一些西洋學科，如倫理、歷史、洋文、體操等重要科目，讓女子獲得修己治家之道。此外，該校校風簡樸，倡導女子掙脫身體上的羈絆，廢除摧殘女子身心的陋習，如塗脂抹粉和纏足，章程規“衣服以樸實潔淨爲主，不得用一切脂粉等類，能不纏足爲合格”²²，以達至女子活動自如的可能性，及把女子真我的一面表彰出來。

另一方面，陳婉衍也力圖改轉社會窘僵的階級結構，她摒棄中國人重視門第之偏見，激發各個階層的婦女之間的流動，強調“本學校經理及教習以至學生，一律平等相待，視中國向來惡習鄉愿一派不同”；“本學校飯食整潔，每日三餐，飯菜每桌之大碗，經理及教習及學生，一律不分厚薄。”²³ 足見其進步的觀念。爲了開闊女子的眼界和胸襟，以激發女子自尊自強，陳婉衍鼓勵和著力推動女子留洋西遊，擬定“如有願遊外洋者，其一切旅費等，概由本學校擔任，以爲有志者勸。”²⁴

至於，陳婉衍的“愛國”表達方式，除了對婦女的啓迪，讓她們肯定其自身的價值和使命，帶領她們投身參與救亡運動，從實踐中喚起她們的愛國心外，她也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成份，如孟子的“民爲貴”、讀書人的“氣節”和“忠孝”等道德教化，充溢著她的民族情懷和崇高的情操。由此可見，陳婉衍在宣揚民族主義和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兩方面都是功不可沒。

2. 拒俄運動

1903 年的拒俄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較大的愛國運動之一，²⁵ 當時的上海婦女積極參與這場愛國鬥爭，這與在拒俄運動之前的啓蒙演說有著密切的關係。

19 〈宗孟女學堂〉，《警鐘日報》，1904 年 3 月 2 日。

20 〈宗孟女學校開會〉，《警鐘日報》，1905 年 1 月 16 日。

21 〈女界之光〉，《警鐘日報》，1905 年 1 月 18 日。

22 〈宗孟女學堂新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3 月 28 日。

23 〈宗孟女學校第三次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9 日。

24 〈宗孟女學校第三次章程〉，《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9 日。

25 尹美英：〈略論辛亥革命前後的婦女鬥爭〉，《渭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年 4 期，頁 48。

誠然，早在 1901 年 3 月 15 日，有兩百多名上海紳商於張園集會，進行愛國演說。²⁶ 接著在同年 3 月 24 日，上海愛國人士第二次於張園集會，抗議沙俄侵略東三省的罪行，主張“力拒俄約，以保主權和領土完整”，商討拒俄對策。²⁷ 該會上甚至有年不過 16 歲的女學生薛錦琴也通曉事理，慷慨陳詞：“今日救急之法，當上下合為一心，以國事為己身之事”，“我等當連合四萬萬人力求政府，請將主持俄約之大臣撤退，另換明白愛國之人為議和大臣，則俄人迫脅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²⁸

1903 年 4 月 30 日上海的愛國人士再次在上海張園舉行抗俄會議，“務本”、“愛國”等女校學生全體參加，在會上千人同聲高唱《愛國歌》，群情激昂，進一步掀起了拒俄運動的浪潮。²⁹ 國內拒俄的消息傳至日本，留日女學生組織“共愛會”，爾後林宗素、胡彬夏等亦參加拒俄義勇軍，進行救護訓練。³⁰ 遺憾的是，清政府竟視學生的拒俄愛國運動為“希圖作亂”，“日前軍機處接上電云，近來愛國黨欲假拒俄之說，擬將北上，恐有不軌事宜，軍機處刻已覆電，令其嚴為查拿訊辦，勿容團結云云。”³¹

在 1903 年冬，陳婉衍、鄭素伊和童同雪在宗孟女學堂設置“對俄同志女會”，帶領女子走向社會。該會著力鼓吹以武力手段對抗俄國的侵略，計劃先設赤十字會在宗孟女學堂內，並添設醫學科，聘任醫學女教習，在會進行速成醫學培訓，奔赴戰地救傷；及訪求俠客，實行暗殺。³² 鄭素伊獨自捐資三千銀元，並願捐出其家資百萬僱用刺客，以殺賣國、誤國諸賊，並聲明“如有應募一試者，不論成敗，素伊願傾家百萬以酬之。”³³ 其時，經陳婉衍在報章的宣傳後，對俄同志女會吸引了 200 名女子參加³⁴。

在 1904 年底，一名俄國水手把周生有殺死，而俄國領土卻拒公開聆訊³⁵，陳婉衍隨即召開大會聲討俄國歹徒，還放映了介紹案件的幻燈片，激起愛國女學生的強烈義憤。³⁶ 陳氏的舉動對拒俄運動起了推動作用，也喚醒了其他女子對此事的關注。同年 2 月 1 日，黃芬慧（生卒不詳）為募資支援拒俄愛國活動，並在《俄事警聞》上發表〈謹告全國之女子〉一文，號召全國婦女積聚零用錢，支援拒俄運動。³⁷

26 〈記張園會議電爭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 年 3 月 16 日。

27 〈記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 年 3 月 25 日。

28 〈薛女士錦琴演說〉，《中外日報》，1901 年 3 月 27 日。

29 〈張園集議〉，《蘇報》，1903 年 5 月 1 日。

30 〈共愛會集議拒俄〉，《江蘇》，1903 年 5 月 27 日。

31 〈軍機要務〉，《蘇報》，1903 年 6 月 26 日。

32 〈對俄同志女會之議案〉，《警鐘日報》，1904 年 1 月 25 日。

33 〈女界之俠義〉，《警鐘日報》，1904 年 2 月 29 日。

34 《上海婦女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婦女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 115。

35 〈各幫紳董會議俄兵砍死華人案〉，《時報》，1905 年 1 月 9 日。

36 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頁 152。

37 〈謹告全國之女子〉，《俄事警聞》，1904 年 2 月 1 日。

在拒俄運動中，陳婉衍展露巾幗不讓鬚眉的才識，由宣傳、活動策劃，以至主持拒俄大會等，都為國家尊嚴和振興中華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3. 女子北伐光復軍

上海光復後積極準備北伐，陳婉衍受光復軍吳淞軍政總司令李燮和之命，奔赴前綫，以服務戰地為依歸。1911年11月16日，陳婉衍等在上海《神州日報》等報刊登〈女子北伐光復軍招募通告〉，號召婦女中有志投效者，速至吳淞軍政府報名。³⁸ 招募廣告發佈不久，即1911年11月21日，當時“女子投效者有七八十人之多”，其中有50人組成女子敢死隊，集結於吳淞軍政分府³⁹。

1911年11月23日，女子北伐軍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隨後開赴南京前綫助戰，這支女子軍以宗孟女校的女學生為基幹，她們朝氣蓬勃、颯爽英姿、鬥志昂揚，為著光復南京而奮鬥。1911年11月26日，陳婉衍帶領吳淞軍政府中女子北伐敢死隊抵達南京前綫，隨即展開戰地救護和後勤服務等工作。當時報紙讚揚她們：“勇猛異常，一洗柔弱之習”；並以攻取南京為目的，故又稱“蕩寧隊”（南京舊稱金寧）⁴⁰。女子投軍從戎、與男子同享參戰的權利，這無疑改轉了女子柔弱的形象，體現女子衝破傳統的禮法約章，也撼動了數千年來的封建堡壘。1911年12月3日進入南京，她們“僕僕征途，風霜跋扈”⁴¹ 從不叫苦，為光復南京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李燮和被任命為光復軍北伐總司令，與陳婉衍所帶領的女子北伐光復軍等，“晝夜操練，預備北伐”⁴²。在1912年1月16日，陳婉衍在《時報》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女子北伐隊宣言〉，她寫道：武昌起義“作四萬萬之先聲”，上海響應“鼓十八省之後勁”，“衍以積之微忱，砥礪而提起，揭竿裂帛，襄李燮和總司令光復上海”；“願我同志，戮力同心，和衷共濟，掃前途之障蔽，求來日之自由”⁴³。她滿懷信心地說：“茲將起程，謹宣其意，他日黃龍痛飲，凱歌南歸，當與我同志共叙共和之幸福也”⁴⁴。陳婉衍的宣言在社會上頗為震動，爾後北伐女子軍相繼聳現，都以北伐為宗旨，如沈佩貞的女子尚武會⁴⁵、林宗素（又稱林宗雪）的女子國民軍⁴⁶ 等。

38 〈女子北伐光復軍招募通告〉，《神州日報》，1911年11月16日。

39 〈女子北伐光復軍開會通告〉，《時報》，1911年11月21日。

40 〈女子敢死隊出發〉，《神州日報》，1911年11月26日。

41 〈女子北伐隊宣言〉，《時報》，1912年1月16日。

42 〈女子敢死隊晝夜操練〉，《神州日報》，1912年1月2日。

43 〈女子北伐隊宣言〉，《時報》，1912年1月16日。

44 〈女子北伐隊宣言〉，《時報》，1912年1月16日。

45 〈女子尚武會招生廣告〉，《神州日報》，1912年1月12日。

46 〈女子國民軍司令林宗雪啓事〉，《民立報》，1912年1月9日。

然而，不久革命派妥協，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得總統之位。南、北統一的願望落空，女子軍也遽然解散。

四、總 結

自清中葉以後，國勢轉衰，西風東漸，撼動了幾千年來以男子為中心的男尊女卑。有識之士開始重新反思一些綑綁女子的封建教條，而當中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倡導尤為顯著。然而，百日維新告吹後，早期的婦女運動也歸於沉默。直至清末以後，國內、外問題日趨尖銳，上海女學勃興，留學者眾，他們才開始透過不同方式宣傳婦女解放思想，再迎合時勢，促進了上海婦女運動的發展。

在 1902 年，蔡元培（1868-1940）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校，宗旨乃承接康、梁時代的“保國強種”觀念，以教學為掩護，加強培育女子從事暗殺工作，及向她們灌輸革命信念。蔡元培興辦女學，以訓練女革命戰士為依歸，發揮女子的才性，也為革命成功作出貢獻，此功績實不能磨滅；然其手法稍微冒進，鼓吹女子從事極為危險的暗殺工作，似乎漠視女子的性命。另外，其辦學的動機也非純為婦女思想解放而努力，仍未能擺脫康、梁時期善用女子特質來為政治服務的思想。

蔡元培在上海興辦愛國女校，實現革命教育，這啟迪了正於上海活動的陳婉衍。她在 1903 年在上海自資創辦愛國女校——宗孟女學堂，以孟子“民為貴”一語為宗旨，故謂之宗孟，“該校開辦以來，即提倡民族主義，以注意精神教育”⁴⁷，充溢著關懷祖國命運的情思。在 1903 年 11 月，陳婉衍在校內另設拒俄同志女會，“為訪求刺客數人，以殺賣國誤國諸賊。”⁴⁸。而該校也奠下平民學校之先聲，摒除門戶之見，喚起各階層的婦女為國家振興而努力，增強她們的民族使命感。此外，陳婉衍頗具開創精神，她在宗孟女學堂創建對俄同志女會，議論政事，帶領上海女學生積極從事拒俄活動，且在報章上刊登宣傳，觸發其他女子也關注俄國在中國的惡行，營造女子議政的社會氣氛，逐步淡化“牝雞司晨”的謬論。無庸諱言，女子的有限度參與政治活動，由家庭至學校，躍進以至邁入社會，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實屬難得。

陳婉衍在上海婦女解放事業上，並不囿於理論，而是徹底付諸行動。從上述所言，她鼓吹女子入學和參與政治，以開闊女子的眼界和視野，從而推動女子自我解放。她在民國初建後，曾在《時報》上發表〈女子北伐隊宣言〉，鼓吹要南北統一，“專制達於極點，滿清之氣運告終；共和程度既齊，漢族之河山當復。”⁴⁹除了文以載道以激起女子的愛國心外，她也身體力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尤其在民初的北伐工作，她甘願冒險帶領女子敢死護衛隊等奔赴戰場，且晝夜操練，為著北伐成功，統一中國而竭力以赴，以

47 〈宗孟女學堂之特色〉，《警鐘日報》，1904 年 9 月 8 日。

48 〈女界之義俠〉，《警鐘日報》，1904 年 2 月 29 日。

49 〈女子北伐隊宣言〉，《時報》，1912 年 1 月 16 日。

躬行實踐的犧牲精神，顯露“女先鋒”的新女性形象。

自清末以來，反傳統的活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蕩滌了幾千年的陳規陋習，其中尤以反纏足為最，例如在 19 世紀末維新派借《時務報》館，開始在上海置不纏足總會，並準備在各省設分會。而康有為在 1898 年 8 月正式上《請禁婦女纏足析》提出：“羸弱流傳，何以為民平”，得光緒支持，不纏足運動，便逐漸推廣開來。⁵⁰ 這也啓迪了正活躍於上海的陳婉衍，故她在 1903 年創辦愛國女學堂——宗孟女學堂的章程中列明入學規則：“能不纏足者最為合格”，體現男女平等的開放精神。更重要的是，陳婉衍引導女子遠離閨閣生活，在 1911 年帶領她們參與女子敢死救護隊，進行救護訓練，充分展現其在女子放足上的理念實踐，讓女子解除身體上的羈絆，踏上征途，為南北統一作出貢獻。

儘管陳婉衍在國家振興和統一事業作出建樹，然而婦女從軍和參與政務，在觀念上仍未得到普遍人民所接納。因此，南北統一後，黃興即下令解散女子北伐軍，並建立復心女學校以安撫這隊女子先鋒，這無疑窒礙了婦女服務政治和社會的權利，也給予熱心推動婦女解放運動的女志士莫大的打擊。自女子北伐軍解散以後，陳婉衍女士除在女子教育上仍舊積極工作外，於參與愛國運動於爾鮮有所聞，她在 1912 年開辦金陵法政女學校，並捐助百元而已。⁵¹

【作者簡介】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50 盧玲：《圖說中國女性》（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頁 275。

51 〈孫中山資助南京法政女學校〉，《天鐸報》，1912 年 3 月 17 日。

◆ 人物研究 ◆

蔡元培研究概況及其展望

侯勵英

記述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1868-1940 年）言論事蹟的文章和專書，數量甚為可觀，不但在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地區，連日本以至歐美等地也有學者加以注意，總的來說，成果相當豐碩。¹ 蔡元培逝世後十年間，有關他的著作以悼念、回憶居多，加上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影響，學術研究困難重重，所以關於蔡元培的研究，至 1950 年代始見眉目。以下試就半個世紀多以來學界研究蔡元培的情況，尤以專書和文集為討論重點，分「開展期」（1950-1979 年）、「興盛期」（1980-1989 年）和「成長期」（1990 年至現在）三個階段作出說明，藉以窺見蔡元培研究的整體進程及箇中變化。

1. 蔡元培研究的開展期（1950 年—1979 年）

蔡尚思著《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於 1950 年出版，是蔡元培研究的先驅之作。書中按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哲學、歷史學、新聞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逐一介紹蔡元培的貢獻，藉以說明他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關係，指出只有在時勢和英雄兩者互相配合之下才可以產生新氣象，如蔡氏於北洋軍閥時代而不在清朝或國民政府時期主持北京大學，是「時勢造英雄」；而由於蔡氏的個人氣魄才能開出北京大學的嶄新局面，正是「英雄造時勢」的說明。² 作者以「思想的前進」、「功業的偉大」、「人格的高尚」和「學

1 于藍編〈蔡元培研究文獻目錄（1948 年 5 月-1998 年 5 月）〉，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79-593，文中統計了由 1948 年至 1998 年中國大陸地區所出版的中文書刊，學術論文有三百多篇，專著或專集亦有二十三本。另可參陳志科、張曉唯編〈蔡元培研究論文資料索引（1949 年 10 月-1986 年 11 月）〉，《蔡元培研究會通訊》，2 期（1987 年），頁 7-13。至於蔡元培研究概況，可參周佳榮〈蔡元培研究的現狀について〉，《史學研究》，135 號（1977 年），頁 66-75；周佳榮〈蔡元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書海》，18 期（1988 年 8 月），頁 29-36；張曉唯〈1979 年以來國內蔡元培研究摘述〉，《歷史教學》，9 期（1987 年 9 月），頁 60-62；張曉唯〈蔡元培研究概述〉，收入氏著《蔡元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204-212；趙慶元著〈煊耀百代人〉，見氏著《蔡元培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11-217。

2 蔡尚思著《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 年），頁 20-21。

問的廣博」來肯定蔡元培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價值，高度讚揚他「不因年老位高而稍落伍」，也「不因寬容大量而不趨新」，故「始終成為新時代新青年的導師」。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下，把蔡元培跟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作比較，批判孔子的思想是「退化論」，反對自由平等，提倡束縛和階級，是「右傾守舊的調和者」；反之，蔡元培主張自由平等，反對束縛和階級，其思想是「進化論」的，是「左傾向新的調和者」。由是孔子只是「歷代帝王的師表」，只能「集舊社會文化之大成」；而蔡氏卻是「一代青年的師表」，成為「新社會文化之開山」。³ 蔡尚思在此書出版後四十多年補充說：「蔡元培之所以能跟隨時代的潮流前進，成為進步人士和青年的衛士與保姆，在於他的思想的日新。」⁴

《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一書的好處是易於檢閱，卻因列述的項目太多，分點介紹了蔡元培的學術思想，致使內容較為鬆散，又未能把蔡氏的思想和活動結合起來考察，予人有割裂之感，以致連日本學者對此書也有所批評，認為整體的構成過於機械性。⁵ 其後，台灣方面出版了以下幾種關於蔡元培的著作：孫德中著《蔡元培教育學說》（台北：復興書局，1956 年），是第一本研究蔡氏教育理論的專書；接著，孫常煒著《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附有〈蔡子民先生傳略〉，內容除討論蔡元培的事蹟、學問、人格和信仰之外，還偏重教育方面的說明；其後，李若一著《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從政治思想的角度探討蔡氏的民族思想、民權思想、社會思想、教育思想以至他對時局的一些看法；至於陶英惠著《蔡元培》（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則是概述蔡元培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的小冊子，可作為研究入門書，當時最稱方便。而最為學界重視的，是陶英惠編著《蔡元培年譜》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此年譜具開創之功，可惜只編到 1916 年；下冊由 1917 年至 1940 年的部分，由於涉及的範圍廣泛，未能及時定稿，一直沒有付梓。雖然如此，此年譜採用「寧失於繁、勿失於略」的宗旨，參考了蔡元培的著述、函牘等多方面文獻材料，其後編撰的蔡元培年譜，大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修訂和增補。

3 蔡尚思著《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頁 1-7。

4 蔡尚思〈序一〉，載蔡建國著《蔡元培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年），卷首頁 2。

5 安藤彦太郎〈蔡元培の生涯とその評価について——蔡尚思《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おぼえがき〉，《中國研究》第 16 號（1952 年），頁 28。

英文方面，1977 年有戴維翰（William J. Duiker）著《蔡元培：現代中國的教育家》出版，⁶ 這本概說式的傳記，是外文最早、目前仍是唯一的蔡元培專書。蔡元培這一類型在中國近代史上極度重要的人物，至今沒有廣泛受到歐美、日本學者注意，多少反映了外國學術界對近代中國未有整體的認識，仍欠缺全面和深度的研究。

II. 蔡元培研究的興盛期（1980 年－1989 年）

1980 年，中國內地舉行「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會」，稱譽蔡元培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宋慶齡（1890-1981 年）在大會上致詞，申明蔡氏「反對蔣介石〔1887-1975 年〕的獨裁統治和對日妥協投降」為精明的做法，他跟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1936 年），「始終保持著深切的戰鬥友誼」是值得欣慰的，並認為蔡氏的精神能夠「對促進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也會起積極的作用」。⁷ 許德珩（1890-1990 年）於大會中強調蔡氏在「九·一八」事變後，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安內攘外」的政策，營救「左派政治犯」與被捕的愛國人士等活動都是應該嘉許的，而且更呼籲在台的蔡元培學生可以「為促進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神聖大業，共同作出貢獻」。⁸

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頗能概括蔡氏一生的重要事蹟，所引用的資料甚為珍貴，有的在當時甚至是初次公開的。周佳榮著《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香港：波文書店，1980 年），較詳細地論述蔡元培前半生的事蹟，從教育背景、辦報生涯、教育事業、政治活動以至留學德國來闡明蔡氏早期的思想趨向。蔡尚思著《蔡元培》（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2 年），補充了他前此《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一書的不足之處，增加描述蔡氏為何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如何營救瞿秋白（1899-1935 年）等人的經過，並加入毛澤東（1893-1976 年）、周恩來（1898-1976 年）等對蔡元培的評價，對蔡氏的政治活動作了較多說明。⁹ 周天度著《蔡元培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凡三十萬字，是一冊用力極深的傳記，此書主要從蔡元培的家世、反清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時期由「迎袁到討袁」的過程，民國時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功績、推行大學區制的情況、創辦中央研究院的原因和經過、抗日時期的救國舉動以至晚年境況，詳細說明蔡氏一生的言論活動，內容是同類著作中最為詳盡的。¹⁰ 唐振常著《蔡元

6 William J. Duiker, *Ts'ai Yua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宋慶齡〈在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會上致詞〉，收入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7。

8 許德珩〈在紀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收入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18-20。

9 蔡尚思《蔡元培》（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62-70、77-78。

10 李侃〈《蔡元培傳》讀後〉肯定周天度的《蔡元培傳》為一本客觀描述，資料豐富的傳記，能使讀者「從歷史感中增強現實感和社會責任感」。見《歷史研究》，1987 年 4 期（1987 年 8 月），頁 133-137。

培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則為論述式的傳記，較注重客觀分析，亦對蔡元培的生平事蹟和言行心態說明得較為深入清楚，書中處理蔡氏與國民黨的關係，更是值得注意。¹¹ 其後，還有李華興著《人世楷模蔡元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把當時這個腐敗的官僚教育機構變成新文化的搖籃；滿腔愛國熱誠的北大學子，且成為五四運動的中堅力量。梁柱著《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遼寧：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一冊用功之作，敘述了蔡氏在北大銳意改革和整頓學校、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學制改革與課程建設等的情形，對於他開創學術研究和思想、自由的風氣，在新舊思潮的激烈衝突中奮起應戰，以及反對軍閥政府摧殘教育等方面，也有相當多的討論。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沒有把他的研究成果與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研究緊扣起來；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此書的修訂本，內容有所增添。專題研究方面，還有聶振斌著《蔡元培及其美學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內容集中探討蔡元培的美學思想，以此闡述蔡氏的學術思想，從中亦說明蔡氏的社會歷史觀、教育救國論、哲學思想、倫理思想等與美學的關係。

1988年5月4日至7日，蔡元培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舉辦「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者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日本以及歐美等地方的專家，發表論文達四十多篇，主辦者並把大部分論文結集成《論蔡元培》一書。¹² 這是把蔡元培放在學術的層次來作討論，而不再單單是發表紀念性文章。書中較為特別之處，是除了輯錄一些討論蔡元培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情況的文章外，還有闡述蔡氏之東西文化交流觀的論文，這實是配合當時以「中西文化交流」為課題的研究動態。舉例來說，開宗明義即談到蔡元培中西文化觀點的，有張寄謙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觀〉、戴維翰(William J. Duiker)的〈蔡元培與東西文化融合〉、王寧的〈蔡元培對中西文化思想的「包」和「融」〉、崔運武的〈論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等文，主要是討論蔡元培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王寧指出蔡氏尊重儒家學說，肯定中庸之道這些傳統文化的特質；¹³ 張寄謙具體地說，蔡氏認為「歐洲文明的優點在於它以科學為基礎」；¹⁴ 崔運武強調由是應該明確了解雙方文化，促進應有的文化交流，在「選擇」、「吸收」和「消化」的過程中，慢慢地創造出一套「高於歐化又適宜於中國國情的新文化」。¹⁵ 此外，梁柱的論文指出，蔡氏

11 周佳榮〈蔡元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書海》第18期(1988年8月)，頁28-36。

12 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是「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包括丁石孫〈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學歷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校長〉(代序)、胡繩〈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20周年〉和周谷城〈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等文共三十多篇。

13 王寧的〈蔡元培對中西文化思想的「包」和「融」〉，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頁193-197。

14 張寄謙〈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觀〉，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頁173-174。

15 崔運武〈論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頁211。

「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就是對「東西文化取兼收並蓄，融匯貫通的主張」，進一步來說，即是對外來文化「擇善而從，重在消化」；而對中國的舊有文化則利用「科學方法來整理，以創造新義」，這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而生的，故能對北京大學進行整頓和革新，為新文化與新思想的傳播開拓出路。¹⁶

《論蔡元培》一書中幾篇探討蔡氏美育思想的論文，如楊坤緒的〈教育領域的大改革家——論蔡元培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的當代性〉、張文泰的〈試論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李辛之的〈近代中國提倡美育的先驅〉等，都是講述蔡氏如何協調中西教育理論中的美育思想；當中尤以楊坤緒的見解較為特出，他指出蔡氏的美學思想講求「傳統美學悅樂精神和道德理性」和「西方美學中自我解放和主體自由的精神」，從而達到「培養健全人格」。¹⁷ 總的來說，《論蔡元培》此書所收錄的論文足以反映 1980 年代蔡元培研究的成果正好結合了當時的研究動向，即以東西文化的特點及兩者如何融合為討論中心，所以有關蔡元培的討論亦主要圍繞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上，大大抹去了過往一些回憶文章所流露出來的情感色彩。

台灣方面，1980 年代也有一些專著出版，如黃肇珩著《一代宗師——蔡元培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 年），立場鮮明，惜引用材料仍不夠完整。孫常煒編著《蔡元培先生年譜長編》上、中、下冊（台北：國史館，1985 年-1987 年），按年月日編寫蔡元培的生平軼事，並附〈蔡子民先生傳記〉，合共二千多頁，規模最稱龐大。其後，孫常煒將這年譜加以修訂，而成為一冊六百餘頁的《蔡子民先生元培年譜》（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III. 蔡元培研究的成長期（1990 年至現在）

1990 年代以來的蔡元培研究，繼承了上個時期的研究成果，得到進一步擴展，研究範疇亦有所轉移；但成果主要見於中國內地，究其原因，是與研究背景的變化有緊密關係的。首先，1990 年代出現多項全國性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計劃」，例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八五」重點課題，研究成果為田正平主編的「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系列叢書；中華社會科學基金「八五」重點課題，由王炳照、閻國華主編了《中國教育思想通史》；全國教育科學「八五」規劃國家教委重點課題，由宋恩榮主編了「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系列研究」等，都是集中探討近代中國的教育理論、教育制度、教育思潮，以至教育家的背景、學問淵源及其教育思想，藉此闡釋各該項目和人物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作用。¹⁸ 上述這些研究計劃的開拓，實對蔡元培研究起了促進作用。

16 梁柱〈論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頁 16-37。

17 楊坤緒〈教育領域的大改革家——論蔡元培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的當代性〉，收入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頁 84-98。

18 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0 年），頁 244-246。

其次，踏入 1990 年代，學界對「文化熱」進行了「深化」和「反省」，¹⁹ 進一步開拓史學的研究領域。這是由於學界在 1980 年代大量援引史學理論，致使出現了「浮躁與空疏」的風氣，故沒法表現中國文化的特色，也未能「讓後學了解學術發展的脈絡」。由是，學者提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突顯」，要求研究方向轉向「國學」，建立富有「中國特色的學問」，以釐清 1980 年代的學風「失範」，出現了「國學熱」的研究熱潮。²⁰ 在這趨勢下，一些被認定為「國學大師」的近代學人成為研究對象，²¹ 蔡元培亦被納入「一代宗師」的群體之中而得到重視。總言之，蔡元培研究在 1990 年代有可觀的增長，學界對蔡氏的教育成就進一步加以肯定，而且把有關研究放在時代和學制的角度來考慮，彰顯了蔡氏的現代意義和歷史地位。新編的文集、年譜、評傳、專題研究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陸續面世，質和量方面都超過以前。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蔡元培史料彙編的出現，如沈善洪以高平叔於 1980 年代編訂的《蔡元培全集》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9 年）為基礎，按哲學、美學與美育、教育、倫理、科學、文化、政治、傳紀八個項目，把蔡元培著述分類列出，編輯成《蔡元培選集》兩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選取了二百六十篇蔡氏在不同時期有關社會活動和教育事業的代表性著述，以方便讀者按類索閱。又有梁柱、王世儒合編《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選錄的文章著重蔡氏與北京大學的關係；陳平原、鄭勇編的《學者追憶叢書——追憶蔡元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年），則是一本紀錄學人追憶蔡元培的文獻資料選輯。

而最重要的，是 1994 年浙江教育出版社為了趁著 1998 年是蔡元培一百三十周年誕辰和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的大日子，邀請高平叔主持，而由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輯了一套總共有十八卷的《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第 1 卷，1996 年；第 2-9 卷，1998 年；第 10-18 卷，1998 年）。這本全集所收的文稿非常豐富，相信蔡氏著譯專

19 湯一介〈「文化熱」與「國學熱」〉，《二十一世紀》，總 31 期（1995 年 10 月），頁 32-35；曹家齊：《頓挫中嬗變——20 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年），頁 252-254；蔣太樞〈20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收入羅志田編《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56-357。

20 陳平原〈學術史研究隨想〉，收入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學人》（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年），第 1 輯，頁 3。「國學熱」的研究特色就是藉吸收西學，重構傳統中國文化及治學方法的特點，並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之餘，把中國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的體系當中作出考究，達到「發揮固有文化，溝通東西事理」的目的。參錢文忠〈又一代人的學術史研究〉，收入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學人》，第 1 輯，頁 10-15。有關 1990 年代中國大陸的國學研究，可參〈學術史研究筆談〉，收入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學人》第 1 輯，頁 248。「國學」就是「近代中學與西學接觸後之中國學術」，而「國學大師」即是「近現代中國有學問的大宗師」，參錢宏〈重寫近代諸子春秋〉，收入於張曉唯著《蔡元培評傳》，頁 5-10。

21 1990 年代出版了一套「國學大師叢書」，胡適、梁啟超、張元濟、錢穆、陳寅恪、馮友蘭、錢玄同等近代學人紛紛列為「國學大師」，並分別出版專書評論。

書、文章和相關史料絕大部分都收錄其中，是目前最爲完備、真有權威性的蔡元培著作總集。它集合了中、美、台的學者，不少散佚的材料也得以補充，所收文稿包括蔡元培撰寫的專著、論文、題聯、書簡、函電、批語、日記、譯文、演說、談話並口述記錄，由他主持制訂或以其名義發佈的重要公文、法規等，即使是蔡氏與別人的合著亦在收錄之列，並作有系統的整理及編排。同時，中國蔡元培研究會還編了《蔡元培紀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選錄1940年代至1980年代多位專家學者和名人對蔡元培的憶述及評價文章，以紀念蔡元培的偉大事功。

其後，因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的出版，浙江教育出版社收到不少海內外人士寄來有關蔡元培的信函，故決定由高平叔和王世儒編註《蔡元培書信集》上、下冊，於2000年出版，共收錄了一千八百七十二件信函，當中有新增的書函多達六十七封，補充了《蔡元培全集》在這方面的不足，甚爲珍貴。

此外，高平叔編撰的《蔡元培年譜長編》上、中、下三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與高氏前此所編的《蔡元培年譜》比較，從字數而言，增加了十多倍；從內容而言，則大幅擴大和增補。高氏除了採用蔡元培的日記函電外，還花了不少時間，將1902至1937年的十幾種報紙雜誌，如《蘇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東方雜誌》、《教育雜誌》等，逐頁翻閱，發現很多重要史料，並把這些珍貴史實全部編入年譜當中，得見用力極深，不失爲一套完整的年譜。²² 其後王世儒編著《蔡元培先生年譜》上、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上冊由1868年至1926年，下冊自1927年至1940年，編者多方蒐集資料和仔細考訂，編排恰當，富有參考價值。

1990年代開始，坊間先後湧現了多種蔡元培評傳，計有：胡國樞《蔡元培評傳》（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張曉唯《蔡元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隗瀛濤著《教育之夢：蔡元培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崔志海《蔡元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張樂天、檀傳寶著《蔡元培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年）；趙慶元《蔡元培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唐振常《蔡元培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鄭勇《蔡元培影集》（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等。其中大部分都是按蔡元培的生平事蹟作時序式的敘述，屬通論性作品，現舉述較有特色的三種傳記於下，以見其大概：

（一）張曉唯的《蔡元培評傳》是「國學大師叢書」之一，實爲響應「國學熱」的

22 關於高平叔編修全集、年譜的情況，可參姚同發〈完成蔡元培囑咐，高平叔筆耕六十載〉，《炎黃春秋》，1998年1期，頁73-75；也有學者對此書作過評論，如唐寶心〈《蔡元培年譜長篇（上）》讀後〉，《歷史教學》，1996年8期，頁56；譚伯魯〈高平叔和《蔡元培年譜長篇》〉，《天津市教科院學報》，1998年4期，頁64-65。另外，陳平原認爲如果《蔡元培年譜長編》能加入報紙、同時代人的日記或回憶錄資料以及於目錄頁中加入蔡元培當年大事簡介，則更爲完備。參陳平原〈「爲了蔡先生的囑託」——《蔡元培年譜長編》讀後〉，收入氏著《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34-40。

研究熱潮而生。此書把蔡元培列為「國學大師」，在於說明蔡氏是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史上一位學貫中西的「通人」，其學術文化的影響表現於兩方面：第一，以調和新舊、融和中西的教育主張來主持學術研究機構，可以「開創新局面，形成新風氣」；第二，以著述或演講詞，可以「傳播文化，昌明學術」。²³ 除了敘述蔡氏的學術生涯、生平行誼、為學風範、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教育事業之外，還著重說明蔡氏的學術貢獻，書中對其著述作了概括介紹，把他由哲學而倫理學而美學，再而民族學的學術研究予以申論，並且指出蔡氏的學術研究實與當時中國以至國際情勢有密切關係。

（二）隗瀛濤的《教育之夢：蔡元培傳》是「強國之夢」系列叢書之一，顧名思義，此書敘述蔡氏一生都是圍繞在教育建設事業之上，藉此說明其「教育救國」的理念。作者突顯對蔡氏的教育救國論作出評價，指出四點：第一，是使舊教育得以轉化到近代新教育；第二，是為近代大學教育提供了經驗；第三，是培育了一批「新式人才」；第四，是為日後中國教育起了借鑒的作用。²⁴

（三）唐振常的《蔡元培傳》是據 1985 年初版重印的，內容、結構與初版相同，〈重印前言〉對初版的錯誤作出糾正，並扼要闡述其對蔡元培研究的觀點。作者指出學界研究蔡元培尚有不少失實的地方，諸如：第一，是錯誤分析蔡氏與國民黨的關係，強調蔡氏即使對國民黨有所不滿，但他依然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是「道統的代表」，始終沒有出現水火不容的地步；第二，是誤解蔡元培歷來支持學生的愛國活動，論證蔡元培是極力反對學生參與愛國活動而影響學業的，「在讀書與救國之間，是有所輕重的」；第三，是誤以為蔡氏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認為這是「為了拔高蔡元培而違背歷史所仍的非科學論斷」，蔡氏雖與學生一樣痛恨北京政府的「賣國行為」，但對於學生參與五四運動是不表贊同的，怎可把蔡氏說成是領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應是陳獨秀（1880-1942 年）、胡適之（1891-1962 年），蔡元培只可說是「為新文化運動護法」而已。²⁵ 此外，唐氏認為蔡元培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革新北京大學校風以至贊成清黨行動，都與自由主義的思想有莫大的關係。²⁶ 此書對蔡氏與國民黨由「親近而疏離」的關係，以及由參加「清黨」到組織民權保障同盟這些在中國內地學術界較為敏感的問題，一一加以論述，實為蔡元培研究史上一項突破。

23 高平叔〈序〉，見於張曉唯著《蔡元培評傳》，頁 2。

24 隗瀛濤著《教育之夢：蔡元培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71-377。

25 唐振常〈蔡元培研究我見——《蔡元培傳》重印前言〉，見於氏著《蔡元培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9。

26 唐振常〈蔡元培研究我見——《蔡元培傳》重印前言〉，見於氏著《蔡元培傳》，頁 9-14。

除了專傳之外，還有涉及其他專題的研究，例如金林祥著《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總論，作者將蔡氏在大學教育、社會教育、女子教育、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活動和主張作了具體的分析，富有參考價值。上文已提過，梁柱修訂了他在1983年寫成的《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改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不論在內容方面或資料選用方面皆比初版增加，進一步說明了蔡元培身為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如何改革學制、整頓校風、延攬教員、建設課程等措施，表揚蔡氏為北大開創學術研究和思想自由之功，對於他在改革過程所遭遇的阻礙亦加以詳細討論，是分析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關係一本甚有份量的著述。²⁷

蔡建國的《蔡元培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分為兩部分，上篇討論蔡元培如何從士大夫轉型為新式的知識分子，如何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何受到日本、德國、法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如何開展留法勤工儉學的運動等課題；下篇主要分析蔡元培的文化思想及其意義，蔡氏與近代中國教育和科學事業的發展，他與孫中山的關係，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以及晚年的活動和貢獻等。此書把蔡元培放在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以專題形式作出研究，從橫向和縱向的角度著墨，實為用功之作。

陳洪捷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分為兩部分，上篇主要討論德國古典大學觀的產生經過，介紹洪堡（Henrik Steffens，1773-1845年）、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的大學觀，並說明古典大學觀在十九世紀的影響；下篇主要是探討德國古典大學觀對中國的影響，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為例，仔細討論蔡氏留學德國的原因和經過，解釋其大學思想與中國學術傳統的關係，接受德國大學觀的情況，以及他對中國大學的影響，藉此了解德國大學觀通過蔡氏對北京大學的改革而使中國學術得以轉型——確立了學術的自主性，產生了新學術觀念，並建立了學術平等觀念。²⁸

27 有關北京大學為研究課題的早期有蕭超然、沙健孫、周承恩等編《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上海：上海出版社，1981年）。配合北京大學成立一百周年，1998年出版了許多討論北京大學的書籍或紀念集，計有王學珍、王效挺、黃文一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兩冊；湯一介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陳平原著《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王學珍、郭建榮《北京大學史料（1912-19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共四卷；外文方面有 Western Timothy Bergmarn, *Beijing Univers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0* (Ann Arbor, Mich.: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1998)，近有中譯本〔美〕魏定熙著，金安平、張毅譯《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這些都是近年來對北京大學研究的新作，但專門探討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的關係，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遼寧：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修訂版）為代表作。

28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90-194。

張曉唯著《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綜論蔡元培、胡適二人的交誼、文化思想的異同、教育獨立之夢、紅學之爭、政治情結、人際交遊與做人風範，透過二人的立身行事，反映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社會生活和心理狀態。此書的論述和分析均見條理及深度，反映了蔡元培研究已有一定進展。

1998年5月8日至10日，中國蔡元培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舉辦「蔡元培誕辰13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主題定為「蔡元培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出席的中外學者達百多人，發表論文共五十七篇，學術交流的氣氛十分熾熱，其後大會更輯錄了四十多篇論文，編成《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從本書所收的論文，可以見到蔡元培研究趨向多元化，討論的層次亦較深入，而且著重蔡氏的教育理論及其實踐對當代教育的啓示。例如蕭超然的〈蔡元培與近現代中國的教育改革〉、王惠來的〈蔡元培的教育宗旨思想初探〉、張立杰的〈論蔡元培「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等文，皆說明蔡元培的教育主張，包括五育思想、「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教育獨立的理念、高等教育的功能、教授治校的體制等，都是富有開創性和回應時局而生的。這些文章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同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不會過時的」，具有啓發性，認為教育工作者可以從中明白「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要求」是釐訂教育目的和教育方針的關鍵因素；蔡氏「五育並舉」的思想，重視學生的主體性以至注重培養「一專多能，文理相遇的人才」，對當今教育作了指導功能，以期改變現時只重視「考試」而忽略德、智、體、群、美的全面人格發展之弊，使教育得以近代化，適合國家的發展，故蔡元培「正是把中國的教育從古代帶入近現代的最偉大先驅者」。²⁹

《蔡元培研究集》中，也有數篇論文討論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關係，如高平叔的〈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梁柱的〈「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思路〉、宋月紅的〈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學的思想探源——兼論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思想〉、魏定熙的〈蔡元培的北大，北大的蔡元培——紀念蔡元培誕辰130周年〉等，指出「西方教育觀念的引入」和「民主思想的影響」俱是蔡氏革新北大的思想來源之一，並具體地介紹蔡氏對北大革新的工作，包括如何招聘教員、如何改革招生制度、如何建

29 詳參蕭超然〈蔡元培與近現代中國的教育改革〉，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張翼星、陳岸瑛〈繁榮學術，培育人才的遠大方略——蔡元培教育思想雜議〉，同上書，頁26；王惠來〈蔡元培的教育宗旨思想初探〉，同上書，頁41-44。另有關蔡元培的國家觀念——把國家置於道德基礎之上，國家意識比民族意識更能團結國民，使社會和諧，由是，「保人權必先衛國權」。詳參王元周〈政治與倫理——蔡元培的國家觀念〉，同上書，頁308-321；趙書剛〈蔡元培的人權理論與實踐〉，同上書，頁322-331。

設課程、如何建立圖書館、如何創辦研究所和運用學報，學術演講會等來整頓學風，以及使北大充滿「濃郁的學術氛圍和良好的學風」。³⁰ 蔡元培雖然明白教育和政治的關係密切，希望學生能夠一方面獨立於政治，另一方面又要肩負對國家的責任，使學校可以「既在文化和教育領域行使權力，而又不積極參與政治鬥爭」，但是最終「北大偏離了學術的軌道」，「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使蔡氏一心改造北大成世界級學府的計劃落空。³¹

此外，《蔡元培研究集》亦有論文從學科分類來說明蔡元培對開拓人類學、民族學、科學、心理學、數學、音樂、體育等方面，說明蔡氏對教育文化事業倡導之功。還有一些文章討論蔡氏與李慈銘（1830-1894 年）、杜亞泉（1873-1933 年）、李石曾（1881-1973 年）、李大釗（1889-1927 年）等人的交遊情況，從側面的角度來了解蔡氏的行事風格。以上種種充分反映出，學者已嘗試利用新的角度來探討蔡元培，但是研究領域仍然以蔡氏的教育事業為主導，期望從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經驗來為當前的教育改革尋求啓示。

IV. 蔡元培研究的檢討

綜觀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內地、香港、台灣以至海外對蔡元培的研究，其研究氣氛得以從沉寂凋零到茁壯成長，實有賴於與學術環境的互相配合，兩者有密切聯繫。特別是在內地，1980 年代以前，由於史學工作者專以馬克思史學來解釋歷史事件，「四人幫」時代的史學且進一步陷入「史為幫用」的惡劣困境，致使歷史研究停滯不前，研究課題亦受到局限，³² 由是，蔡元培研究實在沒法得到開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決心整頓風氣，推行改革開放，致力教育事業，藉此改變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的「歪風」。此外，西方史學理論迅速傳入中國，史學研究趨向多元化，學者亦漸漸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反思和評估，從文化交流和中西史學理論的匯通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兩者的關係。及後卻因大量援引史學理論，出現了「虛浮」的風氣，因而在 1990 年代，學者轉向「國學」研究以建立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體系。加上政府和學術研究機構推行

30 宋月紅〈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學的思想探源——兼論蔡元培的教育救國思想〉，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151-156；梁柱〈「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蔡元培革新北大的一個重頂思路〉，同上書，頁 126-136。而陳以愛〈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國學門〉一文指出蔡元培成立國學門的原因與過程，這所「西方式」的，以國學為範圍的研究機構是應當時「整理國故」的學術活動和在華的歐美式學術機構日漸增多而生的，同上書，頁 430-448。

31 魏定熙〈蔡元培的北大，北大的蔡元培——紀念蔡元培誕辰 130 周年〉，收入中國蔡元培研究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 13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158-165。

32 參遼耀東著：《史學危機的呼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 年），頁 25-69；又遼耀東著：《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 年），頁 1-5；周朝民、莊輝明、李向平編著：《中國史學史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06-214；Harold Kahns & Albert Feuerwerker, "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8), p. 6.

多項重點式的「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研究計劃」，使中國近現代教育史研究顯得相當蓬勃，這也順帶牽動了蔡元培研究，由以宏觀視野來探討蔡氏的生平行誼、教育思想、教育工作，到以微觀角度來細述蔡氏教育理念的淵源及其實踐經驗與當時以至現今教育的關係，以表示蔡氏教育事功的生命力。

具體來說，1950 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年的蔡元培研究，大致有以下兩個特徵：其一，研究規模不斷擴大，討論層面也日漸廣泛，不論是蔡元培的生平、教育方針、五育思想、對北大的改革、推行大學區制，或是蔡氏的教育獨立論、高等教育思想、美育思想、科學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思想等，都被放進研究領域之中。其二，在蔡元培研究的領域中，亦出現了討論的重點，主要是關於蔡氏「兼容並包，自由思想」的教育主張、「美育代宗教」說、「中西文化觀」、「教授治校」、「教育獨立」，以至其教育思想的探源和箇中的時代意義，可見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實非「文革」時的情況所能比擬。

簡而言之，在眾多的蔡元培研究著述中，屬一般記述和介紹的，多於深層次的分析和探討；1990 年代開始，研究漸具規模，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事功結合在教育制度、學術制度的建立來研究，以揭示其現代意義。從 1988 年和 1998 年兩次紀念蔡元培誕辰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來看，可以進一步清楚了解學者的研究興趣正反映著當時的學術風尚：前者顯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問題為學界所重視；後者則表現了史學研究當與時代結合及承擔「借古鑑今」的啓示作用。

然而，就研究課題而言，學界直至目前為止，對蔡元培的研究仍多集中於討論教育方面，而有關哲學、史學和學術思想方面的探究則相對較少；即使關於教育方面的著作，或為紀念性質的文章，或為通盤概述的傳記，內容往往較公式化，又多重覆前人記敘。而學者之間似乎缺少溝通，鮮有嚴格考訂史料，綜合前人成果的工夫也不足夠，故此尚未出現一個完整的研究系統，使蔡元培研究這一領域出現突破性的進展，殊為可惜！

除了已正式出版的學術論著外，近五十年來，蔡元培的生平和思想逐漸成為年青研究者探討的對象，並且寫成學位論文。以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有七篇，³³ 主要都集中於

33 以英文寫成的博士學位論文，計有：(1) Tai Chiu-hsiao (尤戴旭清), "The Life and work of Ts'ai Yuan-p'ei" (Harvard University, 1952); (2) Png Poh-seng, "Ts'ai yuan-p'ei (1868-1940)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4); (3) William J. Duiker, "Ts'ai yuan-p'ei and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68); (4) Eugene S. Lubot, "Ts'ai Yuan-p'ei from Confucian Scholar to Chancellor of Peking University, 1868-1923: The Evolution of a Patient Reformer" (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 1970); (5) Douglas Gordon Spelman, "Ts'ai Yuan-p'ei, 1868-1923"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6) Ts'ai Yu-hsi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Ts'ai yuan-p'ei"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8); (7) Lee Yuen Ting (李嫻婷), "Cai Yuanpei and 'Equal Educational Rights' for Female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3).

闡述蔡氏的教育活動及相關言論；德文、法文、日文也有研究蔡元培的博士、碩士論文，但數量不多。³⁴ 中文方面，至今已有逾十篇碩士論文，計台灣九篇，³⁵ 香港兩篇。³⁶ 就目前所見，多數學位論文均以通論性或專題式探究為主，尤其是關於蔡元培學術思想的研究，仍較少全面性的綜合討論，尚可作進一步加強，以期對蔡元培的言行思想有更深入的認識。

總的來說，中國學界近年對蔡元培研究的興趣有所提高，由於教育問題日漸受到重視，相信不久將有更可觀的成果。

【作者簡介】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候選人。

-
- 34 Hsü chi-wei, Stephan, "The Pedagogy of Tsai yuan-pei: The Encounter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Culture with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and Upbringing" (Münster, 1969) 及 Peili Wan, "Wilhelm von Humboldt and Cai Yuanpei: The Contribu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Universität Köln, 1995)，是用德文寫成的博士論文。此外，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的海博瑪爾蒂娜（Raibaud Martine）完成碩士論文〈蔡元培的影響〉，同校的蔡元培的孫女蔡蘿萊（Lorette Tsai）以〈蔡元培與魯迅的關係〉一文取得碩士學位，又撰寫蔡元培與中法文化關係的博士論文。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國際教育研究室的藏田秀典，其博士論文是關於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 35 台灣方面關於蔡元培的碩士論文有：（1）黃中〈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研究〉（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1962年）；（2）李若一〈蔡元培的政治思想〉（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研究所，1971年）；（3）張力〈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啟蒙運動〉（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79年）；（4）李雄揮〈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1979年）；（5）張火木〈蔡元培與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文化史學研究所，1983年）；（6）沈慶陽〈蔡元培教育思想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1987年）；（7）謝義勇〈蔡元培社會教育思想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1988年）；（8）王清長〈蔡元培體育思想之研究〉（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2000年）；（9）黃柏雄〈蔡元培教育行政思想之研究〉（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年）。博士論文，則有吳耀庭〈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析論〉（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2002年）一篇。
- 36 香港方面，有方凱芸〈五四期間蔡元培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大學，1981年）和雷武鐸〈1911年至1927年間蔡元培對教育與政治的看法〉（香港大學，1998年）兩篇碩士論文。

◆ 人物研究 ◆

嚴復研究的回顧和分析

甘穎軒

嚴復（1854-1921），字又陵、幾道，福建侯官人。早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後赴英留學，在格林威治學堂學習海軍。回國後，歷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復旦大學校長。辛亥革命後，獲委任為國立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復學貫中西，有「西學第一人」的稱譽。他一生翻譯不少西學名著，致力將西方先進的社會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是中國近代其中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

由於嚴復在近代中國知識界地位崇高，歷來都引起不少學者對他產生興趣，有關他的書籍出版更如雨後春筍。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嚴幾道先生年譜》，這是學術界首次將嚴復的資料進行整理。1957年，王棻著《嚴復傳》是歷史學界第一本系統地敘述嚴復生平的傳記，書中將嚴復一生分為海軍生涯、維新運動中的出色思想家、從進步轉到保守、頑固反對的痛壟老人四個階段。關於嚴復思想的整理，相信周振甫的《嚴復思想述評》應該是早年重要的著作之一，作者將嚴氏思想的演化劃分為全盤西化期、中西折衷期和反本復古時期。美國學者史華滋（Benjamin Schwartz）在1964年出版的《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是英語世界研究嚴復的重要著作，作者從中西方思想和文化比較的角度入手，探討嚴復的思想與他對外來西方文化的取捨態度和立場。

自1960年代開始，嚴復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課題，不少在大學修讀研究學位的學生也採用作為論文的選題。1966年香港大學的韓迪厚（Han Di-hou）以《嚴復、林紓、傅東華翻譯檢討》（*A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from the English*）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並在1969年出版成書，開創從翻譯學角度探討嚴復的先河。1972年，香港中文大學的李炯洪（Li Jionghong）以《嚴復翻譯工作研究之一例：赫胥黎之天演論》作為碩士論文題目，也同樣是從翻譯角度探討嚴復的論著。可惜的是，利用這個新角度研究嚴復似乎還未在學術界形成風氣，相關的著述出版一直寥寥可數。

1970年代中後期，隨著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學術界對嚴復的興趣不斷升溫，有關他的史料、文選、傳記、思想等書籍紛紛出籠。據筆者粗略統計，兩岸三地在這段時期出版有關嚴復的書籍有十本之多，當中包括周康燮的《嚴幾道晚年思想（即嚴幾道與

熊純如書札節錄》)(1974)、沈雲龍編《侯官嚴氏叢刻》(1976)、王栻的《嚴復傳》(1976)、劉富本的《嚴復的富強思想》(1977)、朱傳譽的《嚴復傳記資料》(1979)等。

研究嚴復思想的著作在 1980 年代開始蔚然成風。在此之前，相關的研究專著只包括上述史華滋和劉富春兩人的作品。1985 年，陳越光和陳小雅著有《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1986 年，王栻出版共五冊的《嚴復文集》，內裡收錄嚴氏的詩文、譯著、書信、日記等資料，成為日後不少研究嚴復的學者所必須參考的書目。1988 年，林保淳著有《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啓蒙者》，該書是學界首次對嚴復冠以「中國近代思想啓蒙者」的榮譽，雖然只是百多頁的小書，但是作者卻能夠「縱橫兼備」，全書以傳記方式記錄嚴復一生經歷，但同時兼顧嚴氏在不同階段不同思想的形成與轉化。

踏入 1990 年代，嚴復研究在學術界更成為顯學，在短短十年間先後出版 30 多本有關他的各類專書作品。大體上，這個時期的嚴復研究主要離不開個人傳記與學術思想兩大範疇。然而，在研究手法上卻屢有創新。1991 年，王中江採用比較思想的手法，寫成《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啓蒙思想比較》一書。中日兩國在 19 世紀中後期發奮圖強但結果殊異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課題，該書正是奠基在這個思路。同類的作品還包括王克非的《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復與日本啓蒙學者》(1996)。嚴復學貫中西相信沒有人質疑，但究竟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如何在嚴氏身上發酵也是相當有意思的問題，李承貴在 1997 年出版的《中西文化之會通：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思想研究》，就是嘗試解答這個問題。劉桂生、林啓彥、王憲明合編的《嚴復思想新論》在 1999 出版，從嚴復與中西文化交融互釋、嚴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嚴復與盧梭、斯賓塞、嚴復與西方思想和嚴復詩考釋五方面廣集論文，收錄包括張恒壽、汪榮祖、林載爵、周昌龍、黃克武、劉桂生、林啓彥、蔡樂蘇、胡志德、李強、王憲明等著名學者的論文，可算是世紀末對嚴復研究的重要貢獻。其他重要著作還包括黃克武的《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與批判》(1998)、郭國燦的《思想的歷史與歷史的思想：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論集》(1998)等。

除研究嚴復的思想外，有關他的傳記與論著的出版也為數不少。此時期有關嚴復傳記的出版物包括歐陽哲生的《嚴復評傳》(1994)、徐立亭的《嚴復》(1996)、王中江的《嚴復》(1997)、楊正典的《嚴復評傳》(1997)、馮保善的《嚴復傳》(1998)等。有關史料方面的出版，則有馬勇的《嚴復語萃》(1993)、盧雲昆的《社會劇變與規範重建：嚴復文選》(1996)、王思義的《生斯世何必無情：嚴復家書》(1996)、馬克峰的《嚴復林紓詩文選譯》(1997)、林載爵的《嚴復文集編年》四冊(1998)、王慶成的《嚴復未刊詩文函稿及散件著譯》(1998)、嚴璩的《侯官嚴先生年譜》(1999)等。

千禧年後，嚴復熱並沒有絲毫減退跡象，有關著作的出版量仍然可觀。習近平在 2001 年主編《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從科學·教育·社會·學術·知識·政治和史料與通信三方面收集論文共 40 篇。2002 年，台灣學者賴建誠出版《亞當史密斯與嚴復——

〈國富論〉與中國》，透過比較嚴復的〈原富〉與其所根據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探討嚴復的經濟思想，作者能夠注意到嚴復在翻譯過程中的謬誤與偏差和他對《國富論》的理解程度是本書出色之處。作為嚴復家鄉的福建省，對推動嚴復研究當然不甘後人，經由福建省內大小出版出版的嚴復書籍就包括孫應祥的《嚴復年譜》（2003）、皮后鋒的《嚴復大傳》（2003）、羅耀久、林平、周建昌的《嚴復年譜新編》（2004）、盧美松的《嚴復翰墨》（2005）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憲明在2005年出版的《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是根據他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新專書，書中闡釋嚴復本人的民族情懷，並探討《社會通詮》一書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造成的影響。而李建平主編的《嚴復與中國近代社會》、韓江洪的《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等，都是2006年新鮮出爐的重要作品。

從1950年代至今，嚴復的研究並未有任何退潮的跡象，反而不斷升溫，成為學術界長壽的研究課題之一。嚴復研究的熾熱，或許與他作為西學東傳的中介者（agent）有莫大的關係。今天，中國現代化發展仍然如火如荼，汲取西方先進知識的工序仍在進行中，留學生居中扮演的橋樑角色仍然吃重。嚴復作為中國最早期的留洋學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仍然會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

附錄：有關嚴復的書籍一覽

作 者	書 名	出版資料
王蘧常	嚴幾道年譜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王枏	嚴復傳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周振甫	嚴復詩文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周振甫	嚴復思想述評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4.
Han Di-hou（韓迪厚）	A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from the English（嚴復、林紓、傅東華翻譯檢討）	Thesis (M.A.)--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6
韓迪厚	近代翻譯史話	九龍：香港辰銓圖書公司，1969
Li, Jionghong 李炯洪	嚴復翻譯工作研究之一例：赫胥黎之天演論	Thesis (M.A.)--香港中文大學 1972
周康燮	嚴幾道晚年思想（即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錄）	香港：崇文書店，1974
南京大學歷史系國營紅衛機械廠嚴復詩文選注釋組	嚴復詩文選注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5
杭州市法家著作注釋小組	嚴復文選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6
沈雲龍主編	侯官嚴氏叢刻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
王枏	嚴復傳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劉富本	嚴復的富強思想	臺北：文景出版社，1977
史華哲原著；沈文隆譯	嚴復	臺南：長河出版社，1977

B. I. シュウォルツ著；平野健一郎譯	中國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嚴復と西洋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朱傳譽	嚴復傳記資料	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
Tang Han 湯漢	嚴復對張之洞體用論的批評	論文（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部，1979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	論嚴復與嚴譯名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王枋，俞政	嚴復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陳越光，陳小雅	搖籃與墓地：嚴復的思想和道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王枋主編	嚴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6
Chan Man Mou（陳民謀）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en Fu（嚴復生平與思想）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林保淳	嚴復：中國近代思想啓蒙者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
張志建	嚴復思想研究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林國清，林蔭儂	嚴復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牛仰山，孫鴻寬	嚴復研究資料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
史華茲著；滕復等譯	嚴復與西方	北京：職工教育出版社，1990
王中江	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啓蒙思想比較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
高惠群，烏傳袞	翻譯家嚴復傳論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崔運武	嚴復教育思想研究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馬勇	嚴復語萃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歐陽哲生	嚴復評傳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
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	93 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
張志建	嚴復學術思想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王克非	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復與日本啓蒙學者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盧雲昆	社會劇變與規範重建：嚴復文選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王思義	生斯世何必無情：嚴復家書	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
徐立亭	嚴復	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6
楊國榮	從嚴復到金岳霖：實證論與中國哲學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	中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嚴復：第一屆中國近代文化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陳百年先生學術基金會，1996
史華茲著；葉鳳美譯	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李承貴	中西文化之會通：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思想研究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馬克鋒	嚴復林紓詩文選譯	成都：巴蜀書社，1997
王中江	嚴復	香港：海嘯出版社，1997
楊正典	嚴復評傳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林載爵	嚴復文集編年（4冊）	臺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王慶成	嚴復未刊詩文函稿及散佚著譯	臺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黃克武	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與批判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郭國燦	思想的歷史與歷史的思想：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論集	長沙：岳麓書社，1998
馮保善	嚴復傳	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沈蘇儒	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周振甫	嚴復思想述評；嚴復詩文選；譚嗣同文選注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嚴璩	侯官嚴先生年譜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劉桂生、林啓彥、王憲明	嚴復思想新論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王壽南	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吳敬恒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Chan Lai Choi (陳財禮)	Yan Fu (1854-1921)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嚴復與北京大學)	Thesis (M.A.)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吳展良	中國現代學人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論集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郭良玉	嚴復評傳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
習近平	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伍杰	嚴復書評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馬勇	嚴復學術思想評傳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牛仰山	天演之聲：嚴復文選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賴建誠	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	臺北：三民書局，2002
孫應祥	嚴復年譜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皮后鋒	嚴復大傳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俞政	嚴復著譯研究	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黃瑞霖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誕辰 150 周年紀念論文集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張廣敏主編	嚴復與中國近代文化	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
王亞玲、唐希	嚴復與嚴復故居：中國福州嚴復故居紀念館	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4
章育良整理	嚴復詩集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羅耀久、林平漢、周建昌	嚴復年譜新編	廈門：鷺江出版社，2004
盧美松	嚴復翰墨	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
許祖華	嚴復作品精選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王憲明	語言、翻譯與政治：嚴復譯《社會通詮》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韓江洪	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董小燕	嚴復思想研究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皮后峰	嚴復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李建平主編	嚴復與中國近代社會	福州：海風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甘穎軒，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 人物研究 ◆

記《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周秉德深情共話

彭淑敏

2005年12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七時，香港浸會大學四個學生宿舍合辦了一個題為「《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周秉德深情共話」的聯堂講座，由歷史學系協辦，系主任周佳榮教授擔任主持，周秉德女士主講，她的妹妹周秉宜也陪同出席。周秉德是周恩來（1898-1976）的侄女，現年六十一歲，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在講座開始之前，周女士先接受新華社、《大公報》、《文匯報》及《香港經濟日報》等香港傳媒訪問。

當晚來自楊振寧堂、蔡元培堂、周樹人堂及宋慶齡堂的數十名大學生和研究生齊集於冒季美牧師紀念禮堂，一睹周秉德的風采，一同分享她與周恩來生活的經歷和體會。當晚講座的内容，分點簡介如下。

■ 周秉德與周恩來的關係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年青時到日本和歐洲留學，曾到法國、德國勤工儉學，在巴黎參加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最有聲望及影響力的元老之一，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周秉德憶述周恩來是家中的長子，沒有姐妹，周女士的父親周恩壽是他的三弟。周恩來沒有子女，周恩壽曾提出把六名孩子的其中一個過繼給他，但遭周恩來反對，因他自小也是被過繼給叔父，認為這對孩子不公平。

周恩來對自己和親人要求極為嚴格，給弟弟安排低工資、低職位，因此連房子也是細小的，並且不要親友把與他的親屬關係掛在嘴邊。周秉德回憶中的伯父，對孩子的要求也是同樣嚴格的，並定下了嚴格的紀律。除了不許進入他的辦公室外，對孩子的生活作息，也有嚴格規定，要做到跟普通老百姓一樣，上學不可用專用車接送，都是走路或是乘公車，教導孩子不可因伯父是周總理的身份而恃寵生驕。

周恩來對親友卻始終是和藹可親，關懷備至。周秉德父親因患上胃潰瘍，為了讓弟婦能夠工作，三兄妹自小便跟隨伯父周恩來，住進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還把自己的工資拿出來補助弟弟的家庭開支，起初他每月交給弟婦120元，後來增加到150元及200

元，但當時周恩來實際的收入只有 400 元至 500 元左右，卻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工資用作扶養弟弟的孩子，對親人的關愛不言而喻！其時，周恩來反對弟弟因病請假而拿全工資，並指示他提前退休，因當時長期請病假而拿全工資的政府官員實在不少，周總理對親人嚴格的要求是以身作則的一種表現。

■ 周恩來的生活

周恩來對自己的要求同樣嚴格，非常刻苦，從不貪圖享樂，食得很粗，平日只有一飯一饘，生活簡樸。周秉德在周總理去世後，看見他的衣服都是破舊的，還有一些補了幾十遍的藍白條子衣服。至於周總理平日穿的襯衣，看上去都燙得整整齊齊，其實只有從外面看到的領口和袖口是新的。

周恩來對他的子侄的要求，並且是非一般的嚴格，背後卻寄托著他對孩子的期希望，同時反映了他關懷國家的需要。當時青年人最好的出路是當兵，周秉德的五弟秉和與六妹秉建分別到了延安農村和內蒙入伍從軍，生活得到保障；可是周恩來卻要求他們脫下軍服，叫他們回到農村去，讓別人去當兵，當時下鄉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國難當前的時候，當人們紛紛跑到農村去，周恩來就動員親人出來當兵，為國家效力。

周秉德回憶周恩來的生活倒不是完全清苦的，他甚懂得享受。平日他邀請親友回到家中吃飯，都是由伯母鄧穎超（1904-1992）付錢的。周恩來留學法國回來便到廣州生活，並與鄧穎超在廣州結婚，所以對廣東有特別的感情，十分欣賞廣東人的生活習慣，還能說上一兩句廣東話。

周秉德回憶周恩來因為工作繁重，平日很少做運動，閒時只有打乒乓球和到公園散步。周恩來自延安開始已習慣在星期六晚上，跟大伙兒跳跳舞，大家都會排隊跟他跳舞，不過周總理仍會在跳舞時間候舞伴的工作情況。

■ 關於《我的伯父周恩來》

周秉德說多年前遼寧出版社曾找她寫有關周恩來的往事，但遭她婉拒。其後她被一名記者的說話喚醒，不能再默不作聲，為了培養下一代，決定將她所知道有關周恩來的事蹟，他的人品、修養和精神充分地介紹出來。

《我的伯父周恩來》於 2001 年出版，周女士說是她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內容都是有關生活上的事情，因周恩來工作的時候不許小孩在旁，談到有關政事時，甚至連伯母鄧穎超也要退避。

■ 周恩來的性格和作息情況

周秉德憶述周恩來一生只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奮鬥，為中華民族而生，為中華民族而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奔波勞碌，堅持為老百姓著想。

周秉德憶述周恩來對工作相當堅持，因工作繁重，時常在辦公室通宵讀報和工作，伯母鄧穎超早上起來看見這樣，就使周秉德五、六歲的弟弟把伯父從辦公室帶出去到公園散步。周恩來亦會不時在公園內聊聊天，跟老百姓的關係甚為親切。

周秉德解釋因周恩來工作繁重，詩文數量少，只有在三十多歲時寫過一些詩作，而他與鄧穎超往來的書信亦已經出版。

■ 周恩來的愛情故事

周秉德憶述伯母鄧穎超與伯父周恩來一生的關係很親密，對待他弟弟的子女有如己出，對他的工作亦十分支持，因周恩來的工作繁重，而且他常常通宵不眠，缺乏休息，伯母找人特意寫了個「安靜」的牌子，當他在睡覺時便把牌子掛上，以免別人打擾他休息。

周恩來外出工作時，鄧穎超會把西花廳園內的牡丹花壓好寄給他，周恩來收到後便會把它掛起，以慰思鄉之情。有一回當周恩來留在北京工作、鄧穎超卻須到廣州醫病時，他們只好依賴互相寫字條問好。

又因周恩來的工作一直繁重，文革那幾年更是的奔波勞碌，晚年罹患肝癌，加上長期缺乏休息，以致病情不斷惡化。鄧穎超只好仿效文革時流行的大字報貼於辦公室門外，寫上叮囑周恩來注意休息的字句，妻子關懷之情，表露無遺。

■ 周恩來對周秉德最深刻的影響

周秉德憶說周恩來的簡樸生活和人品修養，是最值得尊敬的。他一生憂國憂民，對國家關愛，我們應從心去學習。

周秉德演說時的態度親切溫和，微笑著道出周恩來的往事，回想著他的高風亮節，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講話完畢後，主持周佳榮教授邀請周秉德女士跟同學一同在禮堂內拍照留念。



周秉德女士（前排中）與香港浸會大學師生合照

附錄：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收藏有關周恩來的書籍目錄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南開大學修訂：《周恩來早期文集，1912.10-1924.6》（北京：中央文獻；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文化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 周恩來著，懷恩選編：《周總理青少年時代詩文書信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周恩來 [講]：《關於目前國際形勢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臺灣問題的發言》（廣州：聯友書局，1956）。

- 周恩來等著：《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周恩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編：《周恩來談人生》（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
- 周恩來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周恩來著，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編：《周恩來選集》（香港：一山出版社，1976）。
- 周恩來著，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編輯：《周恩來專輯》（香港：自聯出版社，1971）。
- 周恩來著，南開大學歷史系、天津歷史博物館合編：《五四前後周恩來同志詩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 周恩來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周恩來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香港：三聯書店，1973）。
- 周恩來著：《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 周恩來著：《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 周恩來著：《周總理詩十七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7）。
- 周恩來著：《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在接見全國各地革命師生和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香港：三聯書店，1966）。
- 周恩來著：《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13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周恩來著：《旅歐通信》（出版地缺：人民日報出版社，1979）。
- 周恩來著：《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1958年1月10日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曹應旺著：《周恩來與治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 華民、唐漢編著：《周恩來評點古今人物》（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
- 趙春生、常建國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周恩來旅日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劉涇山等編著：《周恩來的外交藝術》（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8）。
- 慶振軒、王海蘭主編：《周恩來詩歌全集輯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

【作者簡介】彭淑敏，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研究生。

中國體育史大事記

文 兆 堅

時 代	重要事件
商至西周 (約公元前 1600 —前 771 年)	• 商代有專管射事的官或統率弓箭手的官。 • 周代規定男子十五歲要習射，並有射禮。 • 西周時，「角力」即徒手搏鬥出現。 • 西周時，出於娛神與禳災，人們將舟與龍神崇拜結合，形成「龍舟」。
春秋戰國 (公元前 770— 前 221 年)	• 蹴鞠成爲流行的娛樂活動。 • 行氣術出現。又稱吐納、服氣、煉氣、胎息等。這是一種呼吸鍛煉。 • 《莊子·刻意篇》有「導引」一詞，爲導引的最早記載。導引是類似體操的活動。 • 拔河又稱牽鈎、強鈎，始於楚國。 • 圍棋又稱奕，已在社會上流傳。
秦漢 (公元前 221— 公元 220 年)	• 蹴鞠成爲軍事訓練活動；蹴鞠舞、女子蹴鞠亦出現。 • 漢高祖劉邦（公元前 247-195）建造供蹴鞠比賽使用的「鞠域」，即古代足球場。 • 角力改稱「角抵」；角抵與拳術、歌舞、雜技等結合，形成「百戲」。同時亦有「手搏」。 • 在陰陽五行思想影響下，出現不同的行氣術，如「抱神導一」、「周天行氣法」。 • 東漢時期，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與于吉的《太平經》均建立行氣術理論。 • 新導引術出現，即「六禽戲」。 • 華佗（?-208）創「五禽戲」，是模仿虎、鹿、熊、猿及鳥五種動物動作的醫療體操。

魏晉南北朝 (公元 220—581 年)	• 公元三世紀，曹植（192-232）的《名都篇》內有「擊鞠」一詞，是「擊鞠」的最早記載。 • 「相撲」一詞出現，以此與角抵區別。 • 葛洪（284-364）主張多種行氣法，分別是「胎息法」、「鼓口咽氣法」。陶弘景（452-536）則提出吹、呼、唏、呵、噓、咽的吐氣法，它廣受後人重視，並總結成「六字吐氣法」口訣廣為流傳。 • 達摩創十八羅漢手，是後世少林拳的濫觴。 • 開始出現十九道的圍棋，並且建立「棋品」制度，分為九品，現時日本圍棋分為九段即源於此。 • 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撰寫《象經》，說明象棋規則與要旨，為象棋的最終定型奠定基礎。
隋唐五代 (公元 581—960 年)	• 隋代蘇元朗創立「內丹術」，透過一系列的煉養步驟，使精氣神在體內聚凝不散。 • 發明充氣鞠。 • 女子馬球出現；為女性而設的「驢鞠」亦誕生。 • 類似高爾夫球、曲棍球的捶丸、步打球出現。 • 武舉中有射箭項目；婦女射箭亦普遍。 • 孫思邈（581-682）提出咽氣、淘氣、煉氣、委氣、服氣及引氣等行氣法。陶弘景的四傳弟子司馬承禎（647？-735）在原有的行氣方法基礎上，吸收了佛教理論，建立有別於道教上清派傳統氣法的養生方法。 • 內丹術名家輩出，其中陳搏（885-989）創睡功訣（即蟄龍法）是一種睡姿式行氣法。 • 龍舟一律定為五月端午節舉行。 • 東北地區出現名為「竹馬」的冰上滑行運動。 • 有女子拔河。 • 圍棋傳入日本、朝鮮。
宋代 (公元 960—1279 年)	• 蹴鞠藝人的組織誕生，即「齊雲社」，是世界上最早的單項運動協會。 • 馬球成為「軍中戲」。 • 「女鬪」即女子相撲出現。 • 《角力記》出版，為中國最早的體育史著作。 • 「八段錦」產生。 • 出現「水秋千」的跳水活動。 • 出現與今日體制、規則相同的象棋。

元代 (公元 1271—1368 年)	- 元世祖 (1215-1294) 至元十九年 (1282 年)，專門論述捶丸的著作出現，就是《丸經》，作者為寧志齋老人。 -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年)，類似馬拉松的「貴由赤」出現，其較西方現代馬拉松早六百多年。
明代 (公元 1368—1644 年)	- 相撲演變為摔跤。 - 陳元贊 (1587-1671) 東渡日本，向當地人傳授拳術，日人輾轉相傳，最後成為「柔道」。 - 萬曆 (1572-1620) 年間，高濂的《遵生八箋》結合以前的行氣術，並參考了按摩等導引術，創立了《導引卻病歌訣》。 - 天啓五年 (1625)，努爾哈赤 (1559-1626) 舉辦冰上運動會，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冰上運動會。
清代 (公元 1644—1912 年)	- 滿人將蹴鞠與滑冰結合，發明「冰上蹴鞠」。 - 冰上運動傳入中原。 《易筋經》面世。 - 學堂成立，教授西方兵操。 1876 年，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簡稱 YMCA) 成立，於引進西方體育、建立運動場地、組織運動比賽，以及培育體育人材等各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1878 年，田徑運動傳入中國。 1885 年，網球傳入中國。 1887 年，棒球由美國傳入中國。 1890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最早開展了以田徑為主的運動會。 1896 年，籃球傳入中國。 1897 年，香港舉辦足球賽。 1903 年，香港皇仁書院與英國海軍隊進行一場足球比賽，是第一次中外足球比賽。 1904 年，乒乓球傳入中國。同年香港華人足球會成立，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足球組織。1908 年，易名為南華足球會。 1905 年，排球傳到中國。 1906 年，香港舉辦全港渡海比賽，開中國近代游泳比賽之先河。 1909 年，《體育界》創刊，是近代中國史上最早出版的體育刊物。

	• 1910 年，霍元甲（1867-1910）於上海成立精武體操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武術學校。1916 年，精武體操學校易名為精武體育會。此外，南京舉行了全國學校分區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運動會。
民國 （公元 1912－ 1949 年）	• 1913 年，中國參加第一屆遠東運動會，為中國第一次參加國際性比賽。 • 1915 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中國獲總錦標。 • 1916 年，出現女子籃球。 • 1919 年，郭紹虞（1893-1984）的《中國體育史》出版，是當時第一本中國體育通史著作。 • 1922 年，北洋政府廢除學校兵操課，體操科改稱體育科。同年，陸禮華創立「兩江女子師範學校」（日後改名為私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它大大推動了國內女子體育的發展。 • 1924 年，武漢舉行第三屆全國運動會，首次有女運動員參加。同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成立，後於 1927 年主辦第八屆遠東運動會。 • 1925 年，由李惠堂（1905-1979）帶領的樂華足球隊，在上海打敗由外國人組成的足球隊，開創上海華人勝外國球隊的紀錄。 • 1926 年，郝更生（1899-1976）的 <i>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i>（《中國體育概論》）一書出版，是首本中國體育史的英文著作。 • 1928 年，中央國術館成立，促進傳統武術的傳播。 • 1920 年代末，舉重運動傳入中國。 • 1930 年代，台灣出現棒球熱潮。 • 1932 年，中國運動員首次參加奧運會，參賽者為劉長春（1909-1983）。同年，出現土洋體育之爭，國人對傳統與外國體育孰優孰劣，進行了討論。 • 1933 年，香港女子游泳隊幾乎奪得中國全運會游泳賽所有金牌。 • 1934 年，由楊秀瓊（1918-1982）等香港選手組成的中國女子游泳隊，於菲律賓遠東運動會囊括女子游泳所有項目金牌。 • 1935 年，遠東最大體育場在上海建立。

現代 (公元 1949— 2006 年)	• 1954、1958 年，台灣足球隊在李惠堂帶領下，奪得亞運會金牌。 • 1956 年，陳鏡開打破最輕量級挺舉世界紀錄。 • 1957 年，戚烈雲創下一百米蛙泳世界紀錄。同年鄭鳳榮造出女子跳高世界紀錄，成為首位擁有世界紀錄的中國女性運動員。 • 1959 年，第 25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西德舉行，中國大陸運動員奪得冠軍，是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次。 • 1960 年，台灣楊傳廣(1933-2007)奪取十項全能奧運會銀牌。 • 1971 年，中國大陸乒乓球代表團參加日本名古屋第 31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揭開「乒乓外交」序幕。 • 1984 年，中國人民共和國運動員首次參加美國洛杉磯奧運會，奪得金牌 15 枚、銀牌 8 枚及銅牌 9 枚。 • 1988 年，第 24 屆韓國漢城奧運會。中國大陸的成績是金牌 5 枚、銀牌 11 枚及銅牌 12 枚。 • 1990 年，北京舉行第 11 屆亞運會。 • 1991 年，中國大陸運動員於第 6 屆世界游泳錦標賽奪取 8 面金牌，是國人首次獲得游泳世界冠軍。 • 1992 年，在巴塞隆納奧運會中，中國大陸的成績是金牌 16 枚、銀牌 22 枚、銅牌 16 枚。 • 1993 年，第 1 屆東亞運動會在上海舉行。 • 1995 年，陳露乃首名國人獲得花樣滑冰世界金牌。 • 1996 年，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中，中國大陸的獎牌數目是金牌 16 枚、銀牌 22 枚及銅牌 12 枚。李麗珊成為第一位獲得奧運金牌的香港運動員。 • 2000 年，悉尼奧運會中，中國大陸奪得金牌 28 枚、銀牌 16 枚、銅牌 15 枚。 • 2001 年，中國北京市獲取 2008 年奧運會申辦權。 • 2004 年，中國大陸於雅典奧運會獲得金牌 32 枚、銀牌 17 枚、銅牌 14 枚。 • 2005 年，第 4 屆東亞運動會在澳門舉行。 • 2006 年，第 15 屆亞運會在多哈舉行。中國大陸奪得金牌 165 枚、銀牌 88 枚、銅牌 63 枚，香港奪得金牌 6 枚、銀牌 12 枚、銅牌 10 枚，澳門奪得銀牌 1 枚、銅牌 6 枚。
-------------------------------------	---

參考書目

- 伍紹祖編：《中國人民共和國體育史（1949-1998）綜合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
- 徐元民：《體育史》（台北：品度股份有限公司，2005）
- 高翠編：《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 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體育史學會編：《中國近代體育史》（北京：體育學院，1989）
- 崔樂泉：《中國近代體育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崔樂泉：《體育史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 崔樂泉編：《中國古代體育文物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梁容若：〈陳元贊評傳〉，《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 郭希汾編著：《中國體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陳昕、郭志坤編：《香港全紀錄》（香港：中華書局，1997-98）
- 楊向東：《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劉秉果：《插圖本中國體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羅時銘：〈中日相撲傳承關係探析〉，《體育文史》，1 期（1997 年）
- 羅時銘：《奧運來到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Kolatch Jonathan, *Spor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China* (New York: Jonathan David Publishers, 1972)

【作者簡介】文兆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研究生。

清末民國時期的全國運動會

黃耀忠

運動會是一個國家體育發展的「總檢閱」，包含運動員、參與地區、比賽項目、比賽成績等豐富元素，全面地反映出該國的「體育力量」甚至綜合國力。清末民國時期總共舉辦過七次全國運動會（簡稱全運會）〔附表〕，本文擬概述各屆全運會的進行情況，回顧近代中國體育的發展和趨勢，藉此亦有助於了解當時的國民生活和社會狀況。

民國時期舉辦的全國運動會

屆次	日期	地點	運動員人數
第一屆	1910. 10. 18 — 10. 22	南京	140
第二屆	1914. 05. 22 — 05. 24	北京	96
第三屆	1924. 05. 22 — 05. 24	武昌	約 300 至 400 多
第四屆	1930. 04. 01 — 04. 10	杭州	1,627 (男 1,163，女 464)
第五屆	1933. 10. 10 — 10. 20	南京	2,275
第六屆	1935. 10. 10 — 10. 20	上海	2,273
第七屆	1948. 05. 05 — 05. 15	上海	2,677

一、第一屆全運會

教會和學校是近代體育引進中國的重要途徑。1900 年後，教會學校開始舉辦的「校際運動會」，被視為全運會的前身。在南京舉辦的第一屆全運會原名「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亦即「全國學界運動會」。其時無論籌備、規劃以至裁判、工作人員等，皆由外籍教士包辦，他們主要為基督教青年會和教會學校人員，而運動會的文告也用英文發佈。參賽者亦多為各大城市教會學校的學生，此可見「運動主權」操於外國人之手。

本屆劃分華南、華北、武漢、吳寧及上海為參賽隊伍，但只有田徑、足球、網球及籃球四個比賽項目，加上女子不得參加，故規模甚小。正如郝更生所言：「僅是運動會之

雛形而已，且其主要文件多以英文刊印，對於國人之影響渺乎其微矣。」¹

二、第二屆全運會

第二屆全運會由「北京體育競進會」主辦，會務和裁判仍由外國人所負責，主事者則為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候格蘭德，「教會色彩」仍然濃厚。全運會開幕前三天，同一場地剛舉辦完華北運動會，這顯示當時華北區大型運動場所缺乏，同時亦反映運動會的舉辦比較頻密。令人惋惜的是，本屆參賽選手更少，只有九十六人，競逐足球、棒球、籃球、排球、網球及田徑六個項目。難怪郝更生認為，「然全國對比，並未感覺多少興味。」²

無論由主辦機構、比賽項目、參賽人數等方面觀察，頭兩屆運動會都不算是真正的全國運動會。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代中國體育發展史來看，這兩屆開創之功是不能抹殺的。

三、第三屆全運會

第三屆武昌全運會由「全國業餘運動會」及武漢體育人士主辦，是「國人自辦全國運動會之第一遭也。」³除了游泳、棒球用了三、四個外籍裁判員外，其餘工作全由中國人負責，代表了中國收回「體育主權」。此外，本屆運動會的「亮點」還有不少。這包括：海外華人地區、香港、菲律賓以及南洋等地都有派人參加，令賽事衝破疆域界限，成為全球華人的運動會。本屆亦增加了游泳、拳術、體操及童子軍表演，田徑則加設三級跳遠和標槍，項目相對完備，規模比此前為大，每天參觀人數更達四至五萬。另外，政府與民間都對運動會予以支持，華東區公佈的經費報告顯示，省政府、萬國體育會、商務印書館及個人都有捐款，先施公司亦曾慨贈三打半運動背心。⁴女子出現在本屆運動會上更令觀眾驚訝不已，雖然她們參加的只是球類運動，只有獎品，沒有錦標。但「先例」既開，這股潮流便如滔滔江河，不可阻擋。另值得注意的是，本屆田徑賽從英制量度單位改為世界通用的公尺，以符合國際標準。

由上可見，第三屆全運會可算是中國近代體育發展的一個突破。賽事由中國人「一手包辦」，改良後的規則令中國運動會朝西方現代運動會的模式靠攏。至於允許女子參賽，則令男女平等有了更實質的體現。

1 郝更生：〈對於全國運動會之我見〉，《東方雜誌》第三十卷二十號（1933年10月），「體育專號」，頁9。

2 同上，頁9。

3 同上，頁10。

4 廖建林：〈社會變遷與近代體育的發展——對舊中國第三屆全國運動會的歷史考察〉，《求索》2004年第4期，頁235。

四、第四屆全運會

第四屆杭州全運會由國民政府轄下的「全國體育協進會董事會」首次主辦。為配合遠東運動會，籌委會改以省、市為報名參賽單位，這無疑令各地的遴選工作更順利及有效率，此制度亦一直沿用至今。另一方面，除游泳外，其他項目皆轉用米制為量度單位，顯示全運會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可惜本屆組織運作較為混亂，例如：工作人員竟不能判決女子 4x50 米冠亞誰屬，只好列哈爾濱及廣東為雙冠軍；男子萬米跑更荒唐：記圈出錯令上海、廣東、香港最終並列男子田徑錦標賽第一名(亦有指不列名次)。而賽場上且有發令員被選手掌摑。這些醜聞其後幾屆屢見不鮮，成為民國時期運動會難以根治的「惡疾」。第二次參賽的香港隊成績甚佳，與粵、滬共享男子總錦標桂冠殊榮。至於女子組第一名則屬廣東隊。明顯可見，沿海地區不但經濟發達，體育實力亦比較強大，這主要因為當地發展體育的資金較足以及西方體育風氣傳播最先。

五、第五屆全運會

「九一八事變」導致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運會延期，國內形勢驟變亦令賽事蒙上陰影。戴季陶等領導者強調國家藉運動會來團結人民，推廣體育以增強人民體質，抵抗入侵者⁵，「強國保種」的色彩更加鮮明。汲取上屆教訓，國民政府教育部聘專人組籌委會，不過混亂局面依然：萬米跑的冠軍被發現少跑一圈，需要重賽；部分觀眾和運動員到處滋事，甚至有軍官打傷學生的事情發生。

從本屆開始，參賽年齡受到限制，以保障運動員的安全；但參賽人數則不受約束，增加至二千二百七十五人。由於女子參賽及比賽項目增多，本屆產生了二十五個全運會新紀錄。曾參加奧運的劉長春跑出了 10'2 的佳績，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游泳女將楊秀瓊：她囊括游泳冠軍，又有漂亮的面孔，「美人魚」之名應運而生。劉、楊二人成為全運會上的風頭人物，甚至可說是當時的「萬人迷」。

六、第六屆全運會

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運會上，國民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頒佈了《全國運動大會舉行辦法》，規範了參加辦法、比賽規則及錄取方式。新建成的江灣體育場設施為遠東之冠，而會場職員達三百九十七人。開幕禮上又有三百名上海小學生表演太極操。此外，當局安排了幾項中外對抗賽，這些都表明全運會的舉辦日漸成熟、完備。值得一提的是，東北籍運動員入場時，穿著黑色喪服，舉黑白旗，以籲國人毋忘淪陷的東北。觀眾看了，多黯然淚下。我們可以想像一大片黑色帶來的強烈震撼，而全運會一開始便以這樣的形式凝聚了民眾的愛國心。香港隊在本屆續有好表現：楊秀瓊奪得百米自由泳及

5 戴季陶：〈祝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東方雜誌》第三十卷二十號（1933年10月），「體育專號」，頁1。

仰泳第一名，陳振興則獲百米自由式冠軍，足球桂冠亦歸港隊，香港成為當時一股不可忽視的體育新興力量。

七、第七屆全運會

八年抗戰令全運會停頓了十三年。戰後，國民政府首要考慮的是如何重建家園，對付中共。因此第七屆運動會在戰事結束後三年才舉行，當時國共大戰已迫在眉睫。本屆全運會需選拔出席奧運的選手，故進一步增加了乒乓球、舉重及拳術三項比賽。戰爭對運動會帶來不同方面的影響：大部分比賽成績都較以往差，顯示戰爭創傷仍未消除。回歸中國的台灣首次參賽便成績驕人，奪取田徑及棒球冠軍。國民黨派出海陸空軍、聯勤和警察參賽，運動場成為鼓舞士氣，振奮軍威之地。

暴力事件在參賽人數歷來最多的本屆運動會頻頻發生。《大公報》呼籲「打風不可長」，可知場上「打風甚盛」，例如足球裁判被打、裁判員對伙食不滿而毆打大會總幹事。另亦有女子籃球賽觀眾不滿裁判員，「屢以香蕉皮向下投擲」。⁶ 與此同時，貧窮亦「困擾」全運會：華北和東北的代表隊在報上懇請「援助華北選手回鄉」。⁷ 許多運動員及服務人員需要自帶被褥，或自理伙食。《大公報》總編王芸生認為本屆全運會「一是窮，二是兇」⁸，也許稍嫌刻薄；但如河北總領隊史麟所指，「這次全運會是日前中國一切現象的縮影」⁹，則接近事實矣。

八、結 語

從上述七屆全運會的歷史來看，無論是主辦城市或總成績較佳者，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廣東等沿海或中原經濟較發達地區。這與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特色是相同的。事實上，體育與經濟是呈正比關係，體育甚至成為一種「經濟活動」。全運會又體現了中國近代體育競賽制度的基本形成。頭兩屆全運會規模很小，影響有限。隨著運動會的不斷舉行，從第五屆開始，運動員已高達二千多人，參賽地區拓展到香港、東南亞以及台灣，比賽項目包括西方最主要的田徑、球類、游泳等，規模日益擴大，甚至還出現如楊秀瓊般的體育明星。當然，這種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中國傳統的體育如武術便沒有列為比賽項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主辦者的轉變，從教會到中國人再到國民政府，反映了中國收回運動主權的概況。

6 寇振聲等著：《百年體壇掠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頁68-69。

7 同上，頁67。

8 同上，頁69。

9 同上，頁70。



《良友》畫報以香港游泳女將
楊秀瓊作為封面人物



台灣運動員張瑞妍在第七屆
全運會獲女子標槍第一名

全運會的一些改進之處，包括中國政府取回主導權、允許女子參賽等；又或是種種的弊病，如組織混亂、打風盛行、經費不足，在在反映了當時國家基本達成統一、社會提倡男女平等及民族素質仍待改善等狀況。「大社會」可以從「小運動場」上略窺一二。民國時期的運動會亦經常與強種衛國結合在一起，這是因為其時中國正處於危亡存急之秋，急需增強國民體質以抵禦外侮。

雖然全運會在某程度上是精英的參與，並且出現種種令人搖頭嘆息的場面，但它對於培養國人的愛國意識、運動風度和推進近代中國的體育發展，實在有不可否定的作用。或許可以說，這七次運動會為中國人洗脫「東亞病夫」的惡名作出努力及有效嘗試。

【作者簡介】黃耀忠，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課程研究生。

日、韓、琉的傳統節令與體育競技： 以農曆新年、端午節為例

區顯鋒

東亞的日本、韓國、琉球（即日本沖繩縣）等地，由於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農曆節氣皆隨中國，故重視農曆新年及端午節。農曆新年，送舊迎新，應以活力朝氣迎接新一年。古人認為過了農曆五月五日，天氣日漸炎熱，烈日下不適合戶外活動。這是春節和端午節期間出游、參與戶外體育競技的原因。¹ 中國社會傳統以舞獅舞龍慶賀新年，端午佳節以龍舟競賽歡渡一天。究竟歷史上日本、韓國、琉球等地怎樣以體育競技來慶祝這兩個節日？

農曆新年

要數日本人傳統歲首活動²，必屬羽子板，玩法類近羽毛球，至今最少有五百餘年的歷史。除了作為一種康體活動，精緻的球板也是送給孩童的新年傳統禮物。正月玩羽子板早見於十五世紀的文獻資料。貞成親王（1372-1456）在《看聞御記》中永享四年（1432）正月五日條及於 1444 年成書的《下學集》，均記載正月玩羽子的風俗。這種玩意也具有消災除害的象徵意義，以羽子比喻蚊子，孩子們撲打羽子，希望新一年免受蚊患蟲害。³ 今天，東京淺草寺還置有歲末羽子板市集，出售這種遊戲的用具。⁴ 此外，從十二世紀末的宮廷繪卷看到，新春期間不論貴族或街上孩童都成羣結隊玩擊毬。

韓國及琉球在歲時的體育競技風俗甚為相近。歲時元日，韓國婦女在巷里玩「超板戲」，即蹺蹺板。⁵ 琉球女子也跟韓國婦女一樣，玩蹺蹺板，慶祝新年。清康熙（1654-1723，即位年：1662-1722）年間的《中山傳信錄》有這樣的記述：「女子於歲初，皆擊毬為戲。」

1 馮爾康：《去古人的庭院散步：古代社會生活圖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78。

2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新年指的是農曆新年。明治四年（1872）改行西曆，定西曆 1 月 1 日為元旦新年。

3 大林太良、岸野雄三、寒川恒夫、山下晋司：《民族遊戲大事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8 年），頁 155-56。

4 日本國際觀光振興機構：《日本導遊》（缺出版地：日本國際觀光振興機構，2005 年），頁 12。

5 柳得恭：《京都雜志》，載於《東國歲時記、洌陽歲時記、京都雜志合編》（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年），頁 14。

又有板舞戲，橫巨板於木椿上，兩頭下空二、三尺許，二女對立板上，一起一落，就勢躍起五、六尺許，不傾跌欹側也。」⁶ 球類活動方面，如以上引文所說琉球有女子擊毬，韓國則有男子白打蹴鞠，即沒有球門對賽、將球互傳的玩法，洪錫謨（1781-1850）的《東國歲時記》云：「丁壯年少者，以蹴鞠為戲，如大彈丸，上插雉羽，兩人對立，腳勢相交，以連蹴不墜為善技……今沿於此，而自冬為始，至歲時尤盛。」⁷

端午節

日本人早在十世紀認識「競渡」，據日人源順（911-983）的《倭名類聚鈔》有這樣的記載：「金谷國記云今之競渡布奈久良倍楚國風也。」⁸ 但端午節賽龍舟在日本本土並不流行，賽馬和騎射則為傳統不可少的競技活動，只有與南中國接觸頻繁的長崎港和沖繩一帶盛行。⁹

作為江戶時代（1600-1868）唯一對外通商港口，長崎始有端午龍舟競渡，溯自十七世紀，這是受寓居日本的中國人和往來中日的華商影響，但歷史不及沖繩端午競渡悠久。¹⁰ 至於沖繩端午賽龍競渡的起源，1745年寫成的琉球史書《球陽》列出三個說法：第一個是由明初移居琉球的三十六姓閩人（福建移民）帶到琉球那霸；第二個是有位名叫長濱大夫的琉球人從南京學會造龍舟的方法，此後每年五月便有競渡活動；最後一個說法是三山時代（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二十年代）山南王弟汪應祖（生卒年不詳）由南京留學歸國，於1403年即位後，在豐見城的江上舉行賽龍舟活動。¹¹ 康熙年間的清朝使者徐葆光（?-1723）謂琉球「五月五日，競渡龍舟三泊一、那霸一、久米一。」即當時泊村、久米村和那霸已有自己的龍舟。¹² 今天，沖繩縣糸滿市每年定於農曆五月四日進行龍舟競

6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頁219；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載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琉球紀錄續輯》（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頁69。

7 洪錫謨：《東國歲時記》，載於《東國歲時記、洵陽歲時記、京都雜誌合編》（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年），頁51。

8 源順（Minamoto, Shitagō, 911-983）、正宗敦夫編纂校訂：《倭名類聚鈔》卷四（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0-1932年），頁5（裏）。

9 現在日本人將端午節改稱為兒童節，由於明治維新廢除陰曆，改行西曆，所以該節在西曆5月5日慶祝。

10 大林太良、岸野雄三、寒川恒夫、山下晋司：《民族遊戲大事典》，頁55。

11 桑江克英譯註：《球陽》（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頁23-24；糸滿ハーレー歷史網頁：http://www.city.itoman.okinawa.jp/site_hare/rekisi/newpage1.htm [瀏覽日期：2006年1月3日]。大林太良、岸野雄三、寒川恒夫、山下晋司：《民族遊戲大事典》，頁55。

12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第二冊（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頁220；另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下風俗曰：「五月五日，競渡，泊一、那霸一、久米一，共龍舟三。」見氏著：《琉球國志略》（台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14。

渡比賽，沖繩話按日語拼法叫「ハーリー」，漢字即「爬龍」。¹³

古代韓國人主要以打毬、角抵和鞦韆等活動慶祝端午節。韓國史籍裏所謂打毬或擊毬，指的是今日的馬球比賽。按李氏朝鮮（1392-1910）鄭趾麟（1396-1478）等編修《高麗史》，十三世紀起高麗王室在端午設宴觀賞馬上擊毬漸成定例。¹⁴ 同時，以端午擊毬為題的詩歌不少，如高麗末年李穡（1328-1396）的《牧隱集》便有詩作〈追記端午日〉，其中兩句曰：「千步場中馬並馳，飛毬一點欲從誰。」百姓方面，則以鞦韆和角力為傳統節日活動。¹⁵

農曆新年和端午節傳入日、韓兩地後，受到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慶祝內容和活動均有所變遷，其他由中國東傳的節令亦有近似的情況。中國的盂蘭節，日本稱為盆節，兩國皆透過不同儀式祭祀先人。不過，日本民間加入叫做「盆踊」這集體舞蹈，主要有超渡亡靈的「念佛踊」和祈求豐收的「豐年踊」，成為夏令的盛事，與中國盂蘭節的氣氛截然不同。東亞各民族透過共同的節期、不同的儀式活動，顯示他們對人生和生存環境的獨特觀念和演繹方式，亦表現出古代中華文化的傳承，反映東亞地區一元多樣化的漢字文化圈。

【作者簡介】區顯鋒，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13 寒川恒夫監修：《日本スポーツ史》第一冊（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 年），頁 76；糸満ハーレー歷史網頁：http://www.city.itoman.okinawa.jp/site_hare/rekisi/newpage1.htm。

14 朝鮮總督府中枢院編：《高麗以前の風俗關係資料撮要》（東京：国書刊行会，1974 年），頁 395、403、577、588、825、835。

15 按《東國李相國集》卷三的記載，鞦韆在十二三世紀已成為韓國人端午節不可缺少的習俗競技。至於角力，成書於 1849 年的《東國歲時記》記有「角力之戲……端午日此戲甚盛，京外多為之。」柳得恭：《京都雜誌》，頁 25；朝鮮總督府中枢院編：《高麗以前の風俗關係資料撮要》，頁 804；洪錫謨：《東國歲時記》，頁 32。

◆ 學界活動 ◆

「紀念孫中山 140 歲誕辰」專題講座

主辦：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時間：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

日 期	演講題目	講 者
2006 年 1 月 21 日	孫中山與香港	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6 年 2 月 18 日	孫中山與廣東	邱 捷（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6 年 3 月 18 日	孫中山與南洋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2006 年 4 月 22 日	孫中山與美國及法國	陳三井（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2006 年 5 月 13 日	孫中山與日本	林啓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6 年 6 月 10 日	孫中山與梁啓超—— 革命、維新兩派的合作嘗試和 分途發展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06 年 8 月 19 日	孫中山與蔡元培	潘漢唐（亞太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
2006 年 9 月 2 日	孫中山與台灣	呂芳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006 年 11 月 25 日	孫中山與倫敦	黃宇和（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活動 ◆

孫中山紀念館公開講座

- 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 語言：粵語
- 地點：孫中山紀念館專題展覽廳
(香港中環半山衛城道 7 號)
- 名額：45 人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費用：全免 (參加者須繳付紀念館入場費)



孫中山紀念館

香港籌備多時的孫中山紀念館，已於 2006 年 12 月開幕，除展覽有關孫中山的文物資料外，還定期舉行公開講座。2007 年春季的安排如下：

	日 期	題 目	講 者
1	2007 年 1 月 6 日 (星期六)	孫中山紀念館的籌劃與構思	丁新豹博士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2	2007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六)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人與事	李金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3	2007 年 2 月 3 日 (星期六)	孫中山紀念館的文物導賞	陳成漢先生 (孫中山紀念館一級助理館長)
4	2007 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從歷史照片看孫中山時期的 中西區	鄭寶鴻先生 (香港歷史博物館顧問)
5	2007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六)	近代中國歷史照片導讀	周佳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活動 ◆

「香港大眾娛樂的轉變」展覽及講座

☆ 主辦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共同籌劃

☆ 內容 ☆

傳統節慶、街頭娛樂、賽馬與博彩、足球與傳媒、遊樂場及主題公園、遠足和旅遊、電影、粵劇及粵曲、電台廣播、流行歌曲、電視、玩具與玩意、漫畫、卡拉 OK 和網絡娛樂等等

☆ 日期 ☆

2006 年 6 月 14 日至 2007 年 2 月 26 日

☆ 時間 ☆

星期一、三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三免費入場)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聖誕節及農曆新年前夕：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休館：星期二(公眾假期除外)、

農曆新年初一及初二

☆ 地點 ☆

新界沙田文林號 1 號香港文化博物館

☆ 場刊 ☆

《眾樂與獨樂：香港大眾娛樂的轉變》是配合此展覽而出版的場刊，有彩色及黑白照片多幀，定價港幣 20 元，本港各大博物館附設書店有售。



■ 講座系列 I

日 期	講 者	題 目
2006 年 6 月 24 日 (星期六)	周佳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香港報刊與流行漫畫—— 大眾閱讀的樂趣
2006 年 7 月 8 日 (星期六)	鍾寶賢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請看下集大結局—— 港產片與連續劇的循環盛衰
2006 年 7 月 22 日 (星期六)	范永聰博士、黃耀忠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香港球壇春秋
2006 年 8 月 5 日 (星期六)	陳任先生 (資深文化工作者)	大眾廣播與 DJ 文化
2006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六)	區志堅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古今香港導賞及旅遊文化異同

☆ 時間：下午 2:30-4:00

☆ 地點：新界沙田文林路一號香港文化博物館演講室

■ 講座系列 II

日 期	講 者	題 目
2006 年 9 月 23 日 (星期六)	鍾寶賢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流聲歲月——香港唱片業與樂壇造 星記
2006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六)	麥錦秋先生 (資深話劇工作者)	香港戲劇發展——回顧、現況與 前瞻
2006 年 11 月 4 日 (星期六)	鍾寶賢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流聲歲月——香港唱片業與 樂壇造星記
2006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余少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中樂在香港的發展

☆ 時間：下午 2:30-4:00

☆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鄭翼之講堂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活動 ◆

「歷史講堂」定期在中環舉行

2005 年 5 月開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合辦「歷史講堂」，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在三聯書店二樓創 Bookcafe 舉行，至今已近兩年。每次均吸引了不少聽眾參加，人數且有愈來愈多之勢。有關方面特於 20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舉辦「歷史·沙龍」活動，邀請歷次主持和講者參加，大家藉此在百忙中聚首和交流，並討論未來發展。歷史講堂成立以來各次活動的安排如下：

	講 題	講 者	日 期／主 持
1	水滸群英會	何冠環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署理主任及高級講師）	2005 年 5 月 7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2	從中國版圖變遷看歷史	張偉國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5 年 6 月 25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3	從漫畫到動畫——創意文化產業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前瞻	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2005 年 7 月 30 日 區志堅博士主持
4	當代中東政局與兩次世界大戰	沈旭暉先生（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2005 年 8 月 27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5	香港粵語流行文化的黃金歲月	鍾寶賢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5 年 10 月 15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6	孫中山與香港——以皇仁書院作為考察	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5 年 11 月 12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7	認識日本——從德川時期至近現代的進程	趙雨樂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2005 年 12 月 10 日 王章偉博士主持
8	粵港黃大仙信仰的再認識（1890-1930）	游子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鍾潔如（資深出版人） 危丁明（資深編輯）	2006 年 2 月 11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9	中國歷史上的瘟疫與社會	范家偉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導師）	2006 年 3 月 4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10	中國與西方歷史上的巫覡與巫術	王章偉博士（《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副編輯）	2006 年 4 月 1 日 羅金義博士主持
11	納粹黨的興起與新納粹主義	麥勁生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6 年 5 月 6 日 何冠環博士主持
12	可愛者甚蕃——香港文物	鄧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	2006 年 6 月 3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13	青山寺「香海名山」牌坊下的香港故事	劉智鵬博士（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2006 年 7 月 8 日 趙雨樂博士主持
14	霸王別姬的時空想像	葛兆光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6 年 8 月 5 日 危丁明先生主持
15	古希臘的神話世界	張學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2006 年 9 月 9 日 梁偉基先生主持
16	香港與世界的「客家運動」	劉義章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6 年 10 月 14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17	西方傳教士與香港醫療制度的發展	黃文江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2006 年 11 月 4 日 區志堅博士主持
18	孫中山與日本	蘇維初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2006 年 12 月 9 日 林啓彥教授主持
19	開埠初期的香港（1842-1860）	蕭國健博士（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	2007 年 1 月 6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20	從畫像磚認識漢代人的生活	黎明釗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07 年 2 月 3 日 范家偉博士主持
21	明太祖與社區管理	朱鴻林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 年 3 月 3 日 周佳榮教授主持

◆ 地點：三聯創 Bookcafe(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 9 號中商大廈 2 字樓〔 MTR C 出口 〕)

◆ 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 資訊：詳情將於每次講堂前四星期在三聯網（www.jointpublishing.com）刊載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亞洲學術文庫

Asian Studies Series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自 1993 年起，刊行一套題為「亞洲學術文庫」的叢書。這套叢書以論文結集為主，作者多是香港出身的學人，他們有的任教於本港各個大專院校，有的在外地從事教研工作。已刊行的著作計有下列二十種：

- 1、 劉詠聰著《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1993 年。
- 2、 蕭國健著《香港歷史與社會》，1994 年。
- 3、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1994 年。
- 4、 陳湛頤著《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1995 年。
- 5、 梁元生著《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1995 年。
- 6、 何冠彪著《明清人物與著述》，1996 年。
- 7、 李金強著《區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1996 年。
- 8、 廖伯源著《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1997 年。
- 9、 鄭會欣著《改革與困擾——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嘗試》，1998 年。
- 10、 陳家春著《慾魔的透視——中國當代小說與性文化》，1999 年。
- 11、 周佳榮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1999 年。
- 12、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華南研究會合編《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1999 年。
- 13、 葉漢明著《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研究析論》，1999 年。
- 14、 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2000 年。
- 15、 黎志剛著《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2003 年。
- 16、 李焯然著《儒學傳統與思想變遷》，2003 年。
- 17、 王雙懷著《唐代歷史文化論稿》，2003 年。
- 18、 張學明、梁元生主編《歷史上的慈善活動與社會動力》，2005 年。
- 19、 陳偉明著《民族·生態·社會——華南少數民族民族生態述論》，2006 年。
- 20、 趙雨樂著《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2006 年。



當代中國研究：歷史與文化專業

社會科學碩士 (兩年制兼讀課程) 招生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s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入學日期**：2007 年 9 月
- **課程特色**：教學與研究兼容，應用與志趣並包
- **主要對象**：(1) 文教出版及傳播界人士；(2) 政府或公共機關人員；
(3) 文史科及通識科教師；(4) 從事中國經貿工作者；
(5) 對當代中國問題及歷史文化發展有研究興趣的人士

▪ **修習科目**：

必
修
科

- 高級中國研究
- 華南研究
- 中國文化的演變
- 當代中國史專題研討
- 專業論文

選
修
科

- 當代中國社會網絡
- 當代中國社會專題研討
- 中國社會人口學
- 中國資源及環境管理
- 中國城市及區域發展
- 中國地理專題研討
- 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
- 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
- 中國經濟專題研討

- **獎助學金**：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資助，優秀專業論文可獲頒史學獎

諮詢電話：3411 7135 (課程辦公室)

3411 7107 (歷史學系辦公室)

課程電郵：mchinast@hkbu.edu.hk

歷史學系電郵：hist@hkbu.edu.hk

課程網址：http://www.hkbu.edu.hk/sosc/mss_chistud